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樊 琦 于 芹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夏洪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段 洪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 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山东抗战现状及其前途 徐向前 04

【峥嵘岁月】

鏖战齐鲁(三) 吴瑞林 08

“鲁中模范村”桃花坪 石绍庆 11

胶济铁道游击队 冯 翔 13

【名人素描】

南朝陈国大将萧摩诃 邹逸俊 17

曾国华传(二) 王连城 曾林辉 20

【文化掇英】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与兰陵 古 朗 25

【史海撷萃】

历史上的王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吗? 孙振奎 31

【探索发现】

“琅琊”还是“琅邪”?
——“琅琊”字形考 高 雷 34

【蒙山沂水】

沂蒙山深处的“小三线”
李 强 傅家德 王铭泽 公 艳 37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岱崮 本 编 43

【古城旧事】

消逝的莒国城墙 庞 岸 44

【影像沂蒙】

一一五师挺进沂蒙 本 编 50

【诗画赏析】

何九峰择费县终老 平 凡 54

【百家渊流】

关于夏氏起源于山东考 温玉春 59

沂水“刘南宅”宦宦之家的起步者——刘励
刘海洲 67

【文史论坛】

姜太公故里浅探 赵子义 69

【文明之星】

一名新时代军人的突击
——追忆武警山东省总队特战英雄王成龙 陈劲松 潘 明 75

【沂蒙乡亲】

中国著名歌词作家李幼荣 王 滨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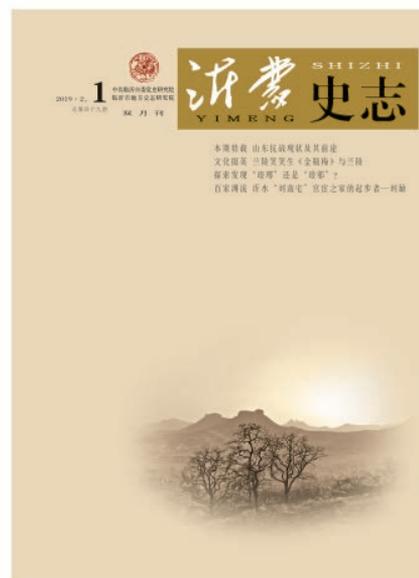
【工作动态】

本 编 80

封面：岱崮

(详见本期《“沂蒙山上好风光”之——岱崮》)

封底：将凡胎俗骨粉碎，化为轻尘，洒向虚空。——龙溪说画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全市党史史志系统内部

山东抗战现状及其前途

(一九四〇年六月)

徐向前



徐向前在滨海抗日根据地

记者：徐将军来领导山东八路军转战齐鲁^[1]，成绩辉煌，希将战争经过情形赐告一二。

答：正如一般人所知，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从武装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从韩复榘^[2]不战而退出济南、泰安，山东全省陷于混乱之局，山东地方八路军游击队即率领广大人民与日寇、汉奸作了殊死的斗争，开始建立了泰山、胶东等大大小小的游击根据地，获得不少的成绩。以后这些地方八路军游击队得到主力的援助，在与日寇血战中壮大了自己，坚强了自己，成为支持山东抗战的主要力量。说起山东八路军的成绩，我手头材料不多，还不能作一个总的统计。记得总计到今年一月为止，将近两年，山东八路军作战次数是一千七百三十三次，计消灭敌伪二万零九百余人，内有日寇官佐联队长以上十八名，大佐以下一百三十八名，俘掳敌伪军二千四百二十七名，同

时更大量损坏了敌人的铁道、公路交通，爆破火车头三十五个、汽车五十四辆、兵舰一艘、火车站二十个、汽车站十八所，缴获数目也是很多，这里可不必细举。总观在我军战略防御、敌人疯狂向我正面进攻的时期，山东八路军做到了配合全面作战，完成阻止敌人进攻的任务。及至进入相持阶段，敌在后方以“扫荡”敌后为主，我们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如鲁西的陆房、梁山战斗^[3]，胶东的青阳、莱阳战斗^[4]，鲁南的五井战斗^[5]、孙祖战斗、青驼寺战斗^[6]，鲁北的刘家井战斗^[7]等，以及其他许多战斗，都相当大的打击、消灭了敌人。鲁南打击过敌人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胶东打击、粉碎过敌人三次大“扫荡”，同时泰山区也粉碎过敌人的十一路围攻，粉碎了敌人连续的大“扫荡”，鲁西曾经打击过敌人许多次的进攻。两年多中间，我们曾经收复过郯城、掖县、莱阳、栖霞、福山、范县、濮县、冠县等县城。同时，我们在山东敌人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中，打击了敌人扩大伪军建立伪政权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阴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坚持与执行了山东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路线，反对了倒退的逆流，进一步促进了山东抗日各阶层的密切合作，开展了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而且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对于顽固派限制、破坏与摧残进步力量和反共、反八路军的罪恶行为，也作了严正的斗争。

记者问：山东抗日根据地现阶段的情况怎样？

答：山东虽然充分具备着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比如有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形，有三千八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又经过进步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抗日的军队——八路军、东北军，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将近三年的奋斗，但严格说起来，直到今天山东还不是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抗日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比如泰山区、抱犊崮山区、沂蒙山区、冀鲁边区^[8]及胶东蓬莱、黄县、莱阳、掖县等地区，共产党八路军及一切进步力量比较大，根据地则巩固。其他地区进步力量还很薄弱。第二，在目前的新阶段中，山东的“反共”，对于进步力量的限制、摧残和破坏，反共反八路军反民主反进步的罪恶行为，仍然很严重。第三，敌人对于山东的进攻一直没有放松过，今后敌人的军事政治各方面的进攻更会一天比一天加紧。虽然我们曾经给过敌人不少的打击，但根据今天敌我具体条件，还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敌人的据点，我们只能临时收复一部分，还没有全部克服的力量。某些地区还在增加困难。第四，山东的抗日军队八路军、东北军，山东的群众性的广泛的游击战争，虽已有了大大的开展，但一般说，目前要转变山东局面，这些抗日军队和地方人民武装在数量和质量上尚须大大的扩大与提高。第五，山东的民主政权在奋斗中建立了基础，已经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民主政权是经常处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及与反共分子搏斗的情况下面。特别是山东的旧势力不合抗战要求、违反三民主义的旧政权，千方百计对民主政权施行摧残、破坏，使民主政权受了很大的限制。第六，山东的抗日民众运动团结了山东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团结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农青妇学生儿童各界救国会，直接配合军队和政权做了许多抗日工作，打击了山东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企图；但山东有三千八百万人民，从比例与需要上说，真正组织到这些抗日团体中的数目还不算大，大部分人民还在敌人汉奸欺压之下。根据这些条件，山东目前一般情况，与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逐渐巩固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落在后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山东还不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还要求我们更大的努力，使山东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坚固起来。

记者问：山东不能很快的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原因在哪里？

答：主要原因是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固与扩大的不够，山东的反共派在反共反八路军的口号下面，实际上帮助了敌人，阻碍了各阶级的团结。同时，打击敌寇

政治进攻的阴谋，向群众深入的揭发和教育，有些地方也是不够的。这是山东不能转变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主观原因。

记者问：在这些情形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前途如何？怎样才能转变到更有利于抗战的局面。

答：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地说，山东这个地区在各种具体条件上，还是能够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山东根据地有着光辉的前途，但这一定要经过比较长困难的过程，必须做好以下各种工作：第一，坚持团结山东的进步力量，反对任何分裂倒退的行为，扫除破坏山东根据地的一切障碍。第二，巩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长期合作。第三，巩固和扩大山东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民众运动，确实实现三民主义，实行进步法令，改善人民生活。第四，扩大进步的党派——国民党与共产党，扩大进步的军队——八路军、东北军，以及那些真正反对“扫荡”，打击敌人的一切地方武装。第五，动员山东一切力量，粉碎敌寇的一切阴谋进攻。第六，以大公无私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光明态度，以抗战第一、进步第一的正确方针，解决山东的磨擦问题。抗日军队及广大人民都深切感觉到，坚持敌后抗战，一定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是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各地人民在民主选举的热潮之下，蓬勃地开展起来，恢复了我国的行政力量。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抗战建国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施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团结山东各阶层，调剂了各阶层的利益，坚决领导山东广大人民的抗战，真正树立了谨严、俭朴、廉洁、吃苦耐劳的作风，接近了广大群众。各县县长、区长带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的英勇模范榜样，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牺牲精神，提高了人民胜利的信心。真正发动了广大妇女的参政运动，真正做到了帮助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些成绩，代表了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没有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要坚持山东的敌后抗战，创造山东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不可设想的。因为民主政权的一切政策合乎广大人民的需要，所以它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敌人据点附近，一些工作人员，得到群众掩护，经常坚持工作，民主政权得到了敌占区人民的支持。泰山专员赵笃生，泰西专员张耀南，为各地群众呼为“救星”。过去一部分人反对民主政权，但在我们艰苦奋斗的感召下，也转变态度，表示钦佩。别的区域的人民经常盼望八路军，盼望获得民主自由。旧政权之下的人民一般希望他们能实行民主的办法，我们也诚挚的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人民的要求。因为不实现民主，想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敌后方，如果要把人民双手紧紧地束缚起来，那只是为日本所希望，为敌人所喜欢。

记者问：按徐将军所说，民主政权的开展，民众运动的加强，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条件，不知目下山东民运情形怎样？

答：山东人民是在反“扫荡”、反退步、反磨擦中间组织起来的。开始时期，部分地区的党派和进步军队的力量，还处在顽固派的“老百姓不能抗日”的口号下，致使民众运动处在沉寂的状态中。但有些地区在济南失陷后，即积极组织了抗日军队，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组织，如鲁南、胶东、冀鲁边区、鲁西北等地。但山东民运的大开展，则是在敌人几次大“扫荡”之后。由于进步党派和进步军队的号召，民主政权的推动，山东民运形成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的局面。在去年六、七月鲁南大“扫荡”以前，山东顽固派把所有人民抗战组织一律解散，企图以包而不办的空洞的无群众基础的官办“群众团体”，代替真正群众自己的组织。结果经不起敌人的大“扫荡”，形势一严重，即消踪匿迹，逃得不见踪影。这更使得山东人民认识到如不组织起来，是不能生存的。因之，工、农、青、妇、儿童、学生等救国会和人民自卫团等，才风起云涌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群众不但有了组织，并且武装了自己，经常配合军队作

战。如山东工人支队，在胶济路上经常袭击敌人，破坏铁路，配合军队积极行动，夺取敌人的枪械来打击敌人。泰山区的自卫团做到了配合抗日军作战，马家口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孙祖战斗中，老太婆、小孩送饭烧水，把军队负伤同志们的枪拿来打敌人。山东人民配合部队袭击敌人据点的事例，多不胜数。鲁西坚持平原游击战，铁丝网一样纵横的路沟，比运河的工程还大，那都是山东人民的血汗成绩。泰山山区的人民，以严密的组织，经常实行戒严，敌探汉奸很难打入那个区域。在山东广大人民的觉醒下面，在将近三年的血的经验中，我们可以说，任何倒退力量，阻碍不了抗日民运的展开。今天，山东抗日民运不但发展了，而且已经走向了统一。尤其是最近山东全省参政会的成立，国大代表的选举，说明山东三千八百万人民，已经知道要生存要自由，需要走哪一条道路。

摘自《徐向前军事文选》

注释：

[1] 齐鲁，指山东省。

[2] 韩复榘，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3] 陆房、梁山战斗，陆房战斗指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至十二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第六八六团大部及津浦支队等部，在山东省肥城东南陆房地区的突围战斗；梁山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第一一五师警卫营等部，在山东省郓城西北梁山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

[4] 青阳、莱阳战斗，青阳战斗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一部，在平度城北的大青阳击退伪军赵保原部的战斗；莱阳战斗即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击败伪军刘桂棠部，解放莱阳城的战斗。

[5] 五井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在临朐西南五井歼灭进犯之日伪军的战斗。

[6] 青驼寺战斗，指八路军山东纵队某部在临沂县青驼寺打击日伪军的战斗。

[7] 刘家井战斗，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八路军纵队第三支队在山东省邹平北刘家井子击退日军进攻的战斗。

[8] 冀鲁边区，指津南、鲁西北以乐陵、南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鏖战齐鲁 (三)

吴瑞林

五、鲁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近千人的武装部队，吃穿问题比起200多人的时候更突出、更严重了。自从5月底杨乡长积极帮助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以后，我们主要依靠驻地附近的几个乡筹措征收部队粮草，但地方已渐感难于负担，有一次召集乡绅们开会，他们就当面流露出负担过重的情绪。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特别是这时沂水一带国民党的县政权早已垮台，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对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又鞭长莫及，正是我们在敌后大发展的好时机，因而也是有条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于是，我们决定迅速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可以颁布政令法规，统筹全局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不仅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还要巩固现有抗日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扩大，开创更大的抗战局面，创建更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大队几位负责同志经过研究，确定发请帖邀集当地抗日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举行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商建政大事。结果有30多位知名人士踊跃参加会议，由邵德孚同志出面主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必要成立抗日民主的县人民政府。我们提出共产党员李贯一和当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民生为县长人选，会上经过民主协商，认定以李贯一任县长较为合适，刘民生老先生也极力这样主张。几天后，又召开第二次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选举产生了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李贯一同志正式当选。由他提名任命县政府各科科长，组建了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中的共产党员有孔庆民同志（第六大队第一连指导员、中共沂水县委组织科长）为民政科长，李子玉同志（县委宣传科长）为教育科长。李贯一同志向大队提出要一个警卫班，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全。我们立即从6个连队中各抽2名战士和1枝枪给他，嘱咐他以这个班作基



邵德孚（前排右三）与鲁中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人员在一起

础，通过地方工作和斗争，继续扩大充实为县政府的保安部队。随后，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民主的基层政权。从此，不但部队的给养有了保障，而且打起仗来也无后顾之忧了。

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隆重召开了庆祝县政府成立大会，到会群众三四千人，盛况空前，群情激奋。大会由邵德孚同志主持。李贯一同志发表讲话，表示坚决团结各界人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实地为人民办事，拥护和支援抗日的人民军队，为抗日救国大业作贡献。各界代表纷纷登台致词祝贺，表示坚决拥护沂水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民主选出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也是鲁中敌后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刘民生和刘惠民两位老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真挚而又简短有力的讲话，他们都说李贯一同志是我们在会上投票选出的县长，这位共产党员我们信得过，我们真心实意地拥护他，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我们自己选出的抗日民主政府。我代表部队讲了话，表明八路军拥政爱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讲话，获得了满怀激情的群众的热烈掌声。

县政府组建后，我们又进一步健全了第六大队队部机关，供给处增配了由5人组成的募集队，政治处增设了专做民运的地方工作团，队部增设1名秘书和2名见习参谋，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约在7月间，遇到回沂水的个别商人说，八路军从鲁南滕县、费县返回来了，现驻在沂水西部的岸堤和蒙阴东部的坦埠。听了这个消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去联系一下，若有省委领导同志在，就可以当面汇报请示，并决定由我和邵德孚同志一同前往。我俩的腿都受过伤，是两个瘸子。从袁家城子到坦埠，只有二三十公里路，可我们俩整整走了一天，天黑了还没走到岸堤，就在离岸堤两里多路的一个骡马店住下，第二天才赶到目的地。果然见到了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等同志。原来他们因鲁南人民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游击纵队的围攻，遂率第四支队第二、三两个团南下驰援，在滕县给反共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部以还击后，经费县返回沂蒙山区。由于郭洪涛等同志从没见过邵德孚同志，我先向他们作了必要的介绍，接着由邵德孚同志将部队组建、整编和扩大，开办干训队，建立县政权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景芝镇抗日武装的情况，并请省委和第四支队对今后工作给予指

示。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非常高兴，说：“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们，恰巧你们自己来了。”他充分肯定了六大队的工作：“你们建军建政的工作都有很大成绩，特别是建立县政权，你们先走了一步，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实行民主建政的经验很好，有创造性，是一种很好的典范，应该推广你们的经验，各地应该向你们学习。”他指示我们：（1）第六大队扩建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罗绩伟任司令员，吴坤任副司令员，杨昆任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2）省委机关现在确定驻于沂水和蒙阴间，第二支队应向鲁东南方向发展，在沂水、莒县、日照三县原工作基础上，建立中共鲁东南临时特委，杨昆同志兼任临时特委书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为委员，以加强党对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莱芜的老党员刘夏峰同志可去日照任县委书记。（3）景芝镇的抗日武装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九支队，由刚从延安到此的刘海涛同志任司令员，刘其人同志任政委，你们将这支部队人枪一并交给他们。（4）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扩大部队，加强人民抗日武装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建立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他还征询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表示坚决执行，只请求省委对内对外分别下达指示和命令，以便依照实施。郭洪涛同志说：“你们先回去，指示和命令，两天内派人送到。”我们连夜返回袁家城子后的第三天，省委的指示、命令以及公告果然一一下达。我们立即召开大会，宣告了第二支队和临时特委的成立。

选自吴瑞林《鏖战齐鲁》

“鲁中模范村” 桃花坪

石绍庆

桃花坪村位于沂水县高庄镇西南10公里处，处于沂水、沂南（马牧池乡、岸堤镇）、蒙阴（坦埠镇）三县交界处。村庄坐落于在高大的盘龙崮西头的山脚下，盘龙崮像一条巨龙，自东向西横卧数里，崮高林密，悬崖陡峭。村西是红山，村东、村北全是山，南面是丘陵，较为开阔。抗战前桃花坪村隶属沂水县四区夏蔚乡，抗战期间改属夏蔚区下里庄乡。1940年，桃花坪村即建立了党支部，张之伦（又名张绪九）任党支部书记，后劳动模范董廷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抗战后期，全村已有党员30多人，群众70多户人，300多口人。

抗战时期南来北往的沂蒙我党政军负责同志许多人在该村落脚，山东分局、沂蒙地委、沂水县委以及区委都把桃花坪看成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点。1942年秋至1946年4月初，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革命老人”范明枢曾在桃花坪村工作生活长达4年时间。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大众日报》著名记者冠西（于冠西，建国后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浙江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曾深入桃花坪，以《上升中的桃花坪》《桃花坪的劳动英雄》《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桃花坪之冬》为题作了长篇通讯。1945年鲁中区授予桃花坪为“生产模范村”称号，被《大众日报》誉为鲁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模范村”。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充分肯定了1942年冬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劳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桃花坪村在区委的领导下，由村党支部成员带头，广泛开展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变工组、纺织组、运输社，开荒种粮、种菜、纺线、养牛、搞运输等，进行生产自救和支援前线，并培养了董廷会、公方英等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劳动英雄。桃花坪全村65户共组织起来13个互助变工组，变工组以贫苦群众为主，采取自愿结合方式组织起来。虽然以自愿结合为原则，但又不脱离群众组织范围，一方面便于保证、监督、发动竞赛；另一面又可通过集体劳动，加强组织内的团结，活跃各组织工作。例如家庭劳动力较多、能够独立集体劳动的户，便单独编组，以保持他们家庭劳动力的完整和齐心热情的优点。对有人力、无荒地而愿参加开荒组的贫困户，村集体划给一定的公荒，或动员有荒不愿开，或开不了的户把荒地让出来，五年以后，允许收回，或按二五减租收租。由于全村山地多、平地少，垒地堰子便成为每年春季比较普遍的大工程，并且这种劳动极适于集体生产，村党支部便研究对有人力、不需要开荒而愿参加集体劳动的户，可在别人还工时帮助他垒地堰子。除了开荒、垒地堰子，在牛力的互助方面，桃花坪村打破过去代耕的范围，以牛为中心，以亩数为单位，把全庄所有需要代耕的无牛户组织起来，根据牛的大小、地质好坏，划成六个互助组。

为加强学习教育，便于议事决策，桃花坪村成立了夜校，全村群众不管工作怎么忙，每晚到夜校学习的达30多人。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变工组时，群众嘴里不在乎、心里不乐意，在区委领导同志帮助下，桃花坪村开始整半夜的检讨和研究，并在冬学和识字班里进行了连续的思想动员，把村干部、积极分子们检讨和研究的结果，利用夜校学习时机展开群众性的讨论，讨论出劳动公约。夜校学习期间，也经常组织考试，督促群众更好的学习。如考试题目有“吴化文要来了妨不妨碍咱生产？”作为夜校的积极分子，没上过学的王兴瑞考了甲班的第三名（第一第二两名都上过几年学），董廷会考了乙班第一名。夜校不仅研究生产事务，也进行政治教育。教员是桃花坪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小学教员张绪九（张之伦）和青救会长张尊道父子俩，在讲课中将政治课跟识字课相结合，既扫除了文盲，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

1941年秋，日伪军“铁壁合围”沂蒙抗日根据地之前，八路军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三所安在桃花坪村，医疗所让村民修筑了40个地洞，准备藏伤员，每修一个地洞给200斤高粱作报酬，40个地洞一夜之间就修好了。“大扫荡”开始后，有20位伤病员转移到桃花坪。在敌人袭扰最紧张的那段时间，伤员都是在村民修的地洞里躲藏。谁家掩护伤员，就由谁家给藏在地洞里的伤员送水送饭，照料伤病员。沂蒙专署秘书主任兼民政科长江海涛就曾在桃花坪隐藏和养病达40余天。

全村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斗争，积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八路军里去，共有40个年轻的男女革命战士，都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功劳，更有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的战斗英雄林茂成。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在劳模董廷会的带领下，全村支援解放军棉花300余斤，军属生产模范韩淑芬、朱先进及张殊福每人捐献500元。孟良崮战役期间，全村群众争先恐后缴纳公粮，女劳动模范公方英自己拉着“碌碡”把麦子打好，将头遍麦子（最好的）第一个送到村公所，全村仅用半天时间就把4800斤麦粮全部缴好，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的战斗。

胶济铁道游击队

冯翔

一首脍炙人口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让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齐鲁大地上有一支威震日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上，还有另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活跃在胶州—济南铁路中段附近，被称为“胶济大队”，在1940年初成立时，便拥有指战员150多名。这支游击队，不但成立时间更早，论当年的名头、战绩、规模等等均不次于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电视剧的那支“铁道游击队”。

这支“铁道游击队”有自己正式的编制，隶属于鲁中军区一旅二团，抗日志士刘子祥任大队长，后由二团八连连长魏宽厚继任。当时任教导员的王丙正才22岁，可谓年轻有为。

这支部队大部分战士的家乡都在现今的淄博市张店区一带。这一路段，是鲁中抗日根据地通向渤海、胶东地区的咽喉要道，泰山和沂蒙山之间的枢纽地带。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舞台上，英雄们演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趁夜连端鬼子四座炮楼

1940年5月中旬，胶济大队决定拔掉位于淄博市东的佛村鬼子据点。

攻打佛村据点并不容易，日军在这里修了1人多高、1米多厚的围墙大院，四角各一座炮楼，院当中还有一座比那四座炮楼还高出2米的中心碉堡，内外机枪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夜袭的战士们两攻不下，只好暂时退到墙外。

王丙正和大队长刘子祥决定采用爆破攻击，他们代表全大队官兵赶到二团团部，向上级请求爆破任务。“当时首长不放心。我们说大队里有个班长叫张盛斋，曾在团爆破班工作过，首长这才同意，发给我们几个炸药包。”王老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拿到炸药包后，两人赶回大队，命令全队组织火力掩护爆

破。

第三次攻击开始了，佛村沉浸在一片枪声、爆破声和硝烟迷雾之中。张盛斋看准时机，抱起捆在木棍上的炸药包，箭步如飞地冲向东南炮楼，拉响了引信，然后一个就地十八滚，猫腰快步返回阵地。

一分钟刚过，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炮楼顿时化为浓烟。不大会儿，又是两声爆炸。铁道游击队所有的战士一齐冲了进去。见东南、西北、东北三个炮楼已经倒塌，伪军多数被石块埋在底下，只有几个衣破鞋掉脸上出血的汉奸跪在地上求饶。

但是，中心炮楼基高墙厚，只炸开一个窗户大的洞，楼身并未倒塌。有两挺机枪又开始向外扫射，一时战士们又难于接近。这时已是清晨4点多钟了。

天将亮。再不结束战斗，日军的援军就会赶到。王丙正索性下令：把剩余的两个炸药包合为一个，对中心炮楼施行最后的突破！刘子祥大队长命令：集中火力封锁炮楼的每个射击孔。步枪、机枪都喷出火舌，子弹如骤雨一样朝炮楼的每个射击孔泼去，敌人在这沉重打击下，如同一只遇到暴风雨的苍蝇般无声无息了。

一阵暴烈的枪声之后，一个重20公斤的大炸药包发出了沉重的怒吼。在耀眼的火光中，尘烟直冲天空，那座矗立在佛村据点中央的高大碉堡转瞬间消失了。只剩下西南角的一座炮楼，像个孤零零的可怜虫呆在那里。战士们堵住门口齐喊：“缴枪不杀！”剩余的20来个伪军乖乖地举着手走出来投降。

太阳出来了。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带着缴获的武器，押着几十个伪军，踏上了东去的弯弯山道。

火车站枪杀日军站长

当时，淄博湖田镇火车站被日寇盘踞，成为日寇伸入我根据地的一个侵略据点。一位铁路工人找到与胶济大队有联系的好友说，如果打火车站，他可做内应。火车站站长加藤为人阴狠毒辣，动辄毒打中国工人，他还会“空手道”，曾把一个中国工人摔成骨折，卧床不起。



在火车站巡逻的伪军

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打火车站十分可行，既打了鬼子，还能缴获枪支。通过当地党组织调查，这位铁路工人说的情况属实，他还提供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车站地图。大队遂决定：组成湖田镇车站突击小分队，拔掉这个侵略据点。

魏宽厚大队长带队，下分三个小队，第一小队为主要任务执行组，袭击站长室，杀死鬼子，夺其枪支，炸毁其住处。第二小队为封锁伪警察住处，用手榴弹把伪军压制在他们的宿舍内。第三小队把住北大门及铁路两侧，防备外出巡逻的敌人支援，保证安全撤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战士们埋伏在预定地点。

晚上10点整，在确定鬼子都已睡下的情况下，行动按计划开始了。

魏宽厚带一、二组迅速进去，三组战士沿路两侧东去，在扳道岔小屋旁埋伏。王丙正亲自把守北门，使一、二组无后顾之忧。

魏宽厚等人直奔站长室，有个值班伪军坐在那里，见有持枪人闯进门来，正要掏枪，被领头的战士一枪击中，再一枪结束了性命。站长加藤听到枪声从梦中惊醒，忙去摸他的20响匣子枪，魏宽厚向其连开数枪，鬼子加藤一命归西。

与此同时，站长室内的鬼子们由于惊慌开始哇哇喊叫，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直打得鬼子消声咽气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才停下手。因为考虑到屋子里还有三个中国工人，就没有点燃炸药，随后第一组撤出车站。

西院的伪军听到东院连连枪声，知道是游击队袭击火车站，慌慌张张地冲出来，第二组战士迎头就是一顿手榴弹，把院子里的伪军又赶回宿舍。这时魏宽厚及时命令第二组顺利撤出车站，与北大门的王丙正会合，并通知第三组，清点人数后，离开湖田镇火车站，按计划回到营地。此次战斗，游击队共消灭鬼子10名，自身却毫发未损。

炸“特快列车”再立奇功

经过侦察，“铁道游击队”发现：从济南到青岛每周三有一趟直达的“特别列车”，经过张店一带都是半夜前后。这趟车只有五节车厢，已经运行两年多，知道的人却很少，因为这趟列车严格保密，坐的不是日本军官就是要人、特务，不是押运钞票、黄金，就是运送特别重要的军用物资。如果能炸掉这趟“特别列车”，收获要比打几个鬼子、缴获几枝枪大得多。

决定敲掉“特别列车”之后，大队开始分工行动，王丙正负责亲自去采购最关键的东西——炸药。

这次任务，购买炸药是最费周折的。当时，日军对附近矿井炸药管理十分严格，矿山工人出矿时都要遭受一番全面的搜身检查。好在党组织在这一带已经活动两年多，群众基础不错。“听说是打鬼子用，工人们想尽办法，一点一点偷出来给我，也不计较多少钱。”就这样，五六天后，30公斤炸药就交到了大队长手中。

经过观察，铁道游击队确定一个小山坡东南侧的一块地段为埋伏点。这一地段是个丘陵地，火车自西向东来时，要转一个大弯，而且还略带下坡，速度快。可以把炸药放在外圈车轨上，因为拐弯时外车轮相对要转速加快，一加快，反射力就增强，地雷就容易爆炸了。另外这里铁路南侧是一片高地，部队隐蔽起来可进可退更可以观察敌情。至于时间，正好是夜里9点30分。

这一天正逢星期三，是“特别列车”从济南开往青岛的日子。奉大队命令，临时组成的一个爆破班和两个掩护班集合于大队部院内。日落前，部队从驻地出发，8点整到达目的地，小组分成三组，一组负责埋压雷，二三组负责拉雷。

不久，西方出现一点萤火虫似的亮光，一会儿就变成明亮的光柱，一列火车像出



胶济线上被游击队炸毁的日军列车

笼的巨兽，咆哮着迎面扑来。轰隆！压雷响了，战士们赶忙拉响了绳索，然后迅速卧倒。轰隆！第二、第三雷也响了。整个山谷都传来轰隆隆的回音。卧伏的战士们一起站起来冲了过去。

只见火车头已经脱轨，一根铁轨翘首朝天，烟火与蒸汽混合在一起，把天都遮上了。第一、二、三节车厢被炸之后，跌进铁道旁的壕沟里。战士们正要钻进去看，不料车上敌人还有没死的，举枪就射。部队任务已经完成，不宜缠斗，便趁乱撤退了。

这一事件影响很大，日本人瞒是瞒不住的。不久，战果就被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报了回来：火车头、锅炉炸坏已无法修复，日本司机、司炉全被炸死，去山东高密执行任务的一个中队日军40多人死伤，死者中有一个大佐、两个少佐和一个上尉。列车上还有十几箱刚从日本本土跨海运来的日本空军战斗机备用部件，也被炸得全部报废。

1945年8月15日以后，原胶济大队发展成一个营，后又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



南朝陈国大将萧摩诃

邹逸俊

萧摩诃，字元胤，兰陵人。兰陵萧氏西晋末年北方士族为避战乱大举南迁，山东兰陵萧氏也渡江徙居至江苏常州附近兰陵郡，即南兰陵。他的名字“摩诃”取自佛经，梵语，意思是“大”。南北朝时不少人的名字与佛教有关，比如崔目连、王僧辩、杜僧明、张僧繇等。

兰陵萧氏是著名大族，萧摩诃的祖父、父亲都在梁朝做过官，摩诃幼年丧父，被姑父蔡路养收养在南康，“稍长，果毅有勇力”。

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

18岁时的一次战役使萧摩诃初战成名。

梁大宝元年（550年）正月，侯景之乱震惊天下，陈霸先（陈高祖）起兵赴援京师北讨侯景。兵至大庾岭，反对讨侯的原定州刺史萧勃指派蔡路养率二万人马拒之，摩诃时年18岁，“单骑出战，军中莫有当者”。激战中，陈军主将杜僧明受伤落马，陈霸先亲自救了他并将自己的马让给他。史载“胆气过人”的杜僧明上马复战，土豪出身的蔡路养遂大败，脱身逃走。



战斗中的萧摩诃（绘画）

溃败中，萧摩诃被陈霸先麾下名将侯安都收留，侯安都很欣赏这员小将的勇力，一直厚待他，从此摩诃就死心塌地跟着侯安都南征北讨。

梁太平元年（556年）三月，北齐出兵10万攻梁。六月，北齐军潜至南京紫金山东北，梁主力军拂晓出幕府山迎战，侯安都率部袭击北齐军后路。战前，侯安都对萧摩诃来了句：“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萧摩诃回答：“今日令公见矣。”激战中侯安都坠马，被北齐军包围，萧摩诃单骑大呼，直冲北齐军，所向披靡，侯安都也因此幸免于难。在梁军的猛烈攻势下，北齐军大败，死伤不计其数。

陈霸先建国后，萧摩诃积累战功升为巴山太守，开始步入他戎马一生的最辉煌时期。

阵斩敌军精锐部队

陈太建五年，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江攻打北齐的秦郡。

北齐派遣大将尉破胡率十万军队来援，这支部队精英济济，前队有号称“苍头”“犀角”“大力”的八尺大汉，个个膂力绝伦，锋芒毕露。另外，军中有个西域的胡人，擅长弓箭，弦无虚发，是远近闻名丧胆的神箭手。

战前，吴明彻对萧摩诃说：“你要是能杀了这个神箭手，敌军就慌了。你有关、张之名，正好斩掉这个颜良。”萧摩诃回答：“您告诉我他的长相就行了。”吴明彻立刻喊来认识这个胡人的投降士兵，了解到胡人的打扮“胡著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

大战开始，吴明彻看到此胡人在阵中，就斟了杯酒给萧摩诃壮行。萧摩诃一饮而尽，驰马冲向齐军，神箭手胡人挺身出阵十余步，还没来得及发箭，萧摩诃先动手了！

萧摩诃远远掷出了铍（尺寸不长的铁制小矛），正中胡人额头，胡人应声而倒。三国时典韦也有掷手戟杀敌的经历，看来“遥掷”短兵器是古代战场上猛将专用。

齐军大惊，号称“大力”的十余人越众出战，又被萧摩诃斩掉，于是齐军大败而逃。

中国古代历史上，冲阵斩将的名将很多，名气最大的是两羽：关羽、项羽。但比之其他名将，萧摩诃更擅长单骑斩将夺旗，只是后世不熟悉罢了。

陈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陈顼命令吴明彻率军继续北伐，到了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萧摩诃率7骑先入，手夺北齐军大旗，北齐军大溃。”萧摩诃因功被授予持节、武毅将军、谯州刺史。

国亡被擒

太建十三年（581年）二月，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雄才大略的隋文帝杨坚欲吞并江南，命贺若弼、韩擒虎镇江北广陵和庐江，预作灭陈准备。陈宣帝即委任骠骑大将军萧摩诃等御隋。隋军水陆并进，逼近长江。

当时陈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外信任佞臣江总、孔范，内沉迷张、孔二美人，政治日益腐败，强大的隋军灭此朝食只是时间问题了。

589年正月，长江下游贺若弼、韩擒虎、杨广等诸路隋军突破长江防线后，对建康已形成包围。

陈叔宝素来不懂军国大事，现在到了燃眉之时，只会“易喜为忧，昼夜啼泣”。

萧摩诃屡请出战，都被拒绝。但犹豫了很久，陈叔宝终于下了决心，跃然出殿道：“兵久相持，未分胜负，朕已厌烦得很，可呼萧郎出战。”可惜，这时想起“萧郎”也迟了。

摩诃听宣进宫。叔宝忙说道：“公可为我决一胜负！”摩诃答道：“出兵打仗，无非为国为身，今日出战，兼为妻子。”叔宝大喜，宣摩诃妻子入宫，先加封号，一面犒军准备决战。

再说下去就是件痛事了，摩诃前妻已歿，后娶的继室却是妙年，貌可倾城，当下艳妆入宫，拜谒叔宝。叔宝见色动心，又把那国家大事置诸度外，便令设宴相待，留住宫中。自与摩诃妻调情纵乐，作长夜欢。——亡国在目，还要淫纵，叔宝无心肝；丈夫浴血在外，老婆与人苟合，这女人也无廉耻。

萧摩诃与鲁广达、任忠、樊毅、孔范等陈朝将领，断断续续摆下了二十里阵营。隋将贺若弼驱军大进，陈将孔范率先逃跑，全军皆溃，其他部队也被牵动，这时的萧摩诃年力又衰（已是近六旬之人），比不得年少时骁勇，一时冲突不出，竟被隋将员明擒去，送至贺若弼前。

贺若弼命推出斩首，摩诃面不改色，反令若弼称奇，乃释缚不杀，留居营中。

萧摩诃遭擒，台城内风声骤紧，文武百官，一哄而散。再往后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陈后主“胭脂井”的故事了。

建康沦陷后，后主被贺若弼置于德教殿，有兵卫看守，摩诃向贺若弼请求：“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得一见旧主，死无所恨。”贺若弼哀而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隋文帝知道后，感叹道：“壮士也，此亦人之所难。”

摩诃之死

陈亡后，隋文帝授萧摩诃开府仪同三司。不久，随汉王杨谅至并州。隋仁寿四年（604年），萧摩诃随汉王杨谅起兵反对其兄杨广称帝。八月，萧摩诃在于清源（今山西省清徐）败于隋名将杨素，被俘后被杀，时年73岁。

萧摩诃既已降隋为何又反？我分析原因有二。直接原因是《隋书》记载的：（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隋文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逼耳。”因赦摩诃。虽然赦了，但总是个疙瘩。何况杨广杀父杨坚自立，杨坚儿子杨谅固然反得有理，摩诃也不为无因；其二，萧摩诃一生功绩尽出于陈，陈朝历代皇帝均待之不薄（后主虽私通其妻，总的来说还是器重于他的），一个几乎一生尽忠于一朝的老将军，晚年身处敌国难免“郁郁思乱”，这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说句刻薄的话——死迟了。既有今日之反，何必当初之降？

陈书点评道：“萧摩诃气冠三军，当时良将，虽无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讷心劲，恂恂李广之徒欤！”

曾国华传 (二)

王连城 曾林辉

“突破口就选在这里”，林彪指着河对岸给曾国华讲解突击队的任务和对策。曾国华看清对岸山腰和山的南北两脚一溜排着3个碉堡，是封锁渡口的主要火力点。林彪讲：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这是敌人的接合部，兵力薄弱，河滩平坦，还有40多米宽的冰排，船容易靠。然后再分头攻占其他两个，向南北发展，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渡河。曾国华等聚精会神，听得清记得牢。林彪又叫曾国华把任务复述一遍，“好，清楚了，回去做准备。”刘亚楼接过来讲：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突过河去，一旦被敌发现，就实行强渡，一定要把滩头阵地拿下来。全师全军的官兵都在看着你们。曾国华一面敬礼一面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月20日下午，红五团为突击队举行会餐。师长刘亚楼专程来给突击队敬酒。他频频举怀，深情嘱托，队员们深受感动。在部队里，有的人为没当上突击队员而难过流泪；有的同志把自己最珍惜的几粒子弹献出来了；还有的把自己的好枪换给他们。面对这些情景，曾国华心情异常激动，觉得有千万只眼睛在瞅着自己，即使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

夜幕降临，突击队集合。曾国华站在队前说了三句话：“记住我们是红五团挑出来的，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我的代理人是龙书金。”说完即带着突击队走在红五团的最前面。快接近渡口时，看见几个人影在岸边晃动，原来是林彪和聂荣臻等军团首长。首长同他们握手，检查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又查看了两条渡船，认为万无一失后才让他们登船。曾国华带领两个突击组和1名信号员登上第一条船，龙书金、周海滨等两个突击组上第二条船。这时刘亚楼又上前叮嘱：“这次渡河，意义重大，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曾国华点头无言，大家谁也没说话，静等开船的命令。

聂荣臻政委的手表时针指向20时整，“开船！”刘亚楼一声令下，两条小船迎着汹涌的波涛，穿过漂浮的冰块，向对岸疾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曾国华两眼死盯着对岸，队员们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战斗。就在小船快靠近岸边冰排时，突然一道电光掠过河面射到第一条船上。“共军！”随着敌兵一声惊叫枪声大作，子弹像暴雨似地打来。曾国华身边的信号员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一

个水手的胳膊也负伤。在这紧急时刻，曾国华大喊：“同志们！不要怕，赶快划，划到岸边就是胜利！”小船一靠上冰排，曾国华站起来一挥驳壳枪：“给我打！”随着一排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突击队员像下山猛虎，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上滩头，杀向敌群，一举拿下中心碉堡，接着分兵两路拿掉南北两个碉堡。这时，敌人纠集约1个连的兵力企图反扑。突击队在曾国华指挥下，当敌人快接近时，先是一排手榴弹，接着拿起刺刀东杀西拼，横劈竖砍，敌人见势不妙，拔腿逃跑。登岸的口子撕开了，滩头阵地站住了。按约定这时要打信号弹，信号员已经牺牲，曾国华命令拾柴点火。随之，团长张振山率领红五团渡过河来。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被红五团一举突破了。战后，突击队长曾国华，突击组长龙书金，队员周海滨、曾宪法、马辉、郑茂发等被誉为“突破黄河天险防线的战斗英雄”，曾国华获勇士奖。

渡过黄河后，曾国华升任红五团副团长。他和团长张振山一起率红五团随红一军团东征。这时，阎锡山手上的一支王牌、号称“满天飞”的敌独立第二旅进至关上村。红五团在林彪指挥下，一举将敌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四团大部歼灭，敌旅长带着残兵败将溃逃。接着红一军团所部又将围在上关村之敌第四旅全歼，因红五团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勇猛，被军团誉为“夜老虎团”。

4月1日，刘亚楼率红二师攻克襄陵县城；张振山、曾国华率红五团解放了侯马镇。

4月中旬，蒋介石派出10个师进入山西。鉴于红军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决定红军撤回陕北。回师途中师参谋长钟学高率领红五团为先锋，在大宁北苏家庄一带与敌关麟征部遭遇，为掩护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张振山、曾国华指挥红五团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战斗十分激烈，部队伤亡很大。师参谋长钟学高，团政委林龙发先后牺牲和负重伤。曾国华挥泪掩埋了一起战斗的首长和战友，踏上西渡黄河的归途。

回师陕北后，团长张振山调抗大学习，曾国华任红五团团长，陈雄任政委。

5月8日，曾国华、陈雄一起参加了党中央在陕西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组成西方面军进行西征。一军团为左路军，红五团在红二师编成内为军团前卫。曾国华、陈雄率五团从延川出发进入人烟稀少一望无际的沙漠。经过4天艰苦的行军，接近环县曲子镇。这时得知，敌马鸿逵部骑兵二零五旅号称“野骡子”的旅长冶成章带领300多骑兵正在曲子镇骚扰。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当即决定，由红二团主攻、红五团助攻歼灭这股匪徒。梁兴初团长指挥红二团从下午2时打到傍晚，从城东南角突开一个口子。“野骡子”确实能打，他的部下都是亡命之徒，个个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凶猛反扑，突破口眼看要被敌人夺回去。这时担任助攻的红五团，在曾国华指挥下从镇西北角发起攻击，经过一场激烈的夜战，将敌人大部歼灭。唯有冶成章带着贴身卫队躲进一个窑洞里负隅顽抗。红五团是有名的“夜老虎”，他们采用往烟筒里扔手榴弹的办法，炸伤了冶成章并将其活捉。

1936年8月，曾国华、陈雄率红五团参加了攻打李旺堡战斗，9月又随一军团特别支队占领将军台，接着又攻下德隆县的乔石堡。

11月，为粉碎蒋介石调动5个军的“进剿”，毛主席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狠狠打击胡宗南的中央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山城堡战役。11月21日黄昏，担任主攻的红五团，在曾国华、陈雄的率领下，首先向敌七十八师发起攻击。当攻到山城堡镇附近的山脚时被敌火力压住。杨得志师长命令曾国华撤下大部队，派小分队迂回进攻。曾国华看地形时负伤，他带伤和陈雄政委各带一个连，分头从两侧迂回到敌堡群前，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堡端掉。部队冲击中又遇到暗堡的阻挡，陈雄从战士手中夺过一束手榴弹俯身滚向敌堡，随着一声巨响敌堡倒塌，陈雄政委和一连连长壮烈牺

牲。曾国华怀着满腔仇恨率领部队和四团在一起将敌人1个团压在一个山坳里。战士们冲进敌群与敌人杀成一团。天黑分不清敌我，既不能开枪也不能投弹。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摸帽徽”。因为胡宗南官兵的帽子上有帽徽。战士们抓到先摸帽徽，如帽子上有帽徽就用手榴弹砸，用枪托砸，仗打得又激烈又残酷，持续到拂晓才结束。山沟里山坡上全是砸死砸伤的敌人。这场战斗以红军歼敌1个旅部5个团的辉煌战果胜利结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曾国华进入抗大学习。他作为抗大第二期学员编在干部队。入学后见到时任抗大训练部长的刘亚楼。老首长告诉他：“只能打仗不行，政治、军事的理论，历史的、革命的知识都得懂一些，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曾国华记住老首长的话，他深知自己文化低、懂得少，有这个学习机会一定要多学点东西。经过半年的学习，曾国华的政治理论水平有提高，军事知识明显增加，革命道理懂得多了，思想境界也开阔了，真有了长翅膀的感觉。

“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曾国华结束了学习生活，拿着毛主席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毕业证书，回到了战斗岗位。

第三章

1937年7月，曾国华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任营长。六八五团团团长杨得志对他说：你知道二营是红五团改编的，是毛主席带上井冈山的队伍，所以叫你来二营，一是你是这个团的老人，情况你都熟悉；二是你带过这个团，组织上相信你在抗日战场上能继续发扬红五团的优良作风。党的信任，给予曾国华以极大的鼓励。25年以后，1962年冬，曾国华路过济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为他设便宴时，曾国华还提到这次令他终生难忘的谈话。

8月22日，曾国华参加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此起彼伏，群情激奋。会后，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在侯马地区集结乘火车北上。曾国华带领的六八五团二营和政训处邓华主任率领的政训处干部及宣传队组成先遣列车。列车车头挂着“北上抗日”四个大字，列车两侧则是“拥护共产党抗日宣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的标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太原车站停车几个小时，各界群众自发地聚集一起，有的控诉日本法西斯暴行，有的表达爱国之心，有的决心要报国仇家恨，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祝愿八路军多打胜仗。面对这种动人的场景，曾国华和二营的干部战士同仇敌忾，热血沸腾，誓死杀敌复仇，报国救民。

9月14日，一一五师到达五台山地区集结。9月23日，曾国华参加一一五师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林彪师长部署在平型关山口十多公里长的古道中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战斗。9月24日夜，曾国华率二营由冉庄向白崖台进发。部队踩着崎岖不平的山道，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25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区进入阵地。二营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上午8时左右，空中传来嗡嗡声，两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曾国华喊“大家隐蔽好”“不要暴露目标”。敌机刚飞走，就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3000余人、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马车，顺着沟谷向西行进。当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二营的防守地段，师指挥所发出攻击命令，曾国华猛喊一声：“打！”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猛打鬼子打头的汽车，一排子弹过去，敌人的头车就在沟头起火抛锚了，跟在后面的汽车、马车全被堵在沟

里，你冲我撞，动弹不得。被打蒙的鬼子们嚎叫着跳下汽车盲目射击。这时，曾国华挥动驳壳枪，大喊：“冲啊！”带着二营杀向敌群，展开白刃战。冲在最前面的五连连长曾宪生号称“猛子”，拼起刺刀不要命，带着五连与鬼子兵杀得难解难分。他前突后刺，接连捅倒了五六个鬼子，自己也多处负伤。曾国华在远处看见猛喊：“曾宪生！”眼见被几个鬼子一起围起来，他毅然拉响了手榴弹，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鬼子同归于尽。身负重伤的连指导员杨俊生，见到连长壮烈牺牲，不顾伤痛，猛喊：“为连长报仇！”带领全连冲上1363高地，把鬼子赶了下去。二营经过一场激战，炸毁10多辆汽车，占领了辛庄东侧一段公路，完全切断了被围之敌与增援之敌的联系。这时，团长杨得志又命令二营转兵东进，攻占老爷庙西南侧的制高点。曾国华即带六、七两连向老爷庙发起进攻。经过一番刺刀见红的生死肉搏，打退鬼子多次反扑，完全控制了那个制高点，又协同兄弟部队全歼老爷庙南侧之敌。

激战仍在继续。曾国华又奉团长杨得志的命令指挥一营四连夺取被鬼子占领的1900高地。当时四连伤亡较大，已不足百人。路经国民党军阵地时，一位国民党军官讥笑说，“我们一个营都没敢上，你们这点人还不够鬼子塞牙缝的。”“别去送死啦！”曾国华强压气愤以蔑视的口吻说：“朋友，不要长敌人的士气！”四连连长龙守义气愤不过，又回敬了几句：“打仗这玩艺，不完全在人多少，关键是怕不怕死，要怕死再多屁用。”他们带着对鬼子的仇恨，对国民党军队的气愤，向1900高地发起猛烈冲击，一鼓作气冲了上去，鬼子留下几十具尸体逃下山去。随后二营又奉命转到老爷庙东南侧阻击增援之敌，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胜利完成掩护全师转移的任务。

在平型关大战中，曾国华率领的六八五团二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敢拼，杀出了“模范红五团”的威风。二营五连荣获“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锦旗一面。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首长根据中央洛川会议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敌后和战区”精神，命令六八五团二营五、六、七、八连加上一营四连，统由曾国华指挥，携带电台一部，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

出征前，曾国华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进行动员：“这次二营远离领导，深入敌后单独活动，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是肩负领导的重托，背负敌后人民的希望，干部、党员要带头，听指挥、讲团结、守纪律，一定齐心协力，不辱使命。”曾国华讲到这里，连长龙书金就站起来表态：“营长请放心，你率领我们干，一定能完成任



油画《平型关大捷》

务，干出名堂来。”这些经过长征，突破黄河天险，又杀过平型关的勇士们，就像一艘鼓满风帆的船向游击战争的海洋出航了。

1937年10月，曾国华和副营长王丽水、参谋长陈祖林率二营五个连队在娘子关以西的正太路上活动，为配合太原保卫战，负责破坏敌交通，打击敌方运输队。中旬一天，日寇一零八师沿正太路西犯。曾国华决定打鬼子的伏击。他事先选好有利的伏击地形，把部队隐蔽在蔡峪矿村后的山谷中，待机歼敌。中午12时左右，当日寇大队人马已过，尾随一个运输队约100多人，内有30多名鬼子，押运满载辎重的100余辆大车陆续进入村内。五连事先化装成群众的10个小组，立即组织“欢迎”，安顿敌人在村内休息吃饭。这时，曾国华见战机成熟，立即下令“吹起冲锋号！”全营突然发起攻击，内应外合，四面夹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抱头乱窜，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战士们押着80余辆大车、70余匹战马，满载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罐头食品，迅速向异地转移。

10月下旬，曾国华奉命随三四三旅副旅长周建屏转入河北平山县一带活动。曾国华分析了当地的敌我斗争形势，作出积极的战斗部署。他利用日寇西犯，后方空虚，敌伪政权又初建的空隙，首先率部袭击井陘，一举俘获敌伪军700余人，部队的名声大振。接着又利用这个声势，抓紧时机，将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依靠“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广泛募捐，到处收枪，大量招兵，成绩颇佳。从而解决了部队无经费、少吃穿、缺枪支的难题，部队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随之抗日政权和地方武装也纷纷建立起来。

不久，日寇发现其后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便对平山地区进行“扫荡”。二营奉命在阳泉附近正面阻击敌人。曾国华立即集结分散活动的部队，利用山高林密的地形，挫败敌人多次进攻，毙伤了大量敌人，激战一整天，敌人未能越过二营阵地，败兴撤回。

11月末，一一五师决定以二营为基础，加上平山县武装，编为一一五师1个支队。为保留红五团的番号，对内称五支队，对外称永兴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龙书金任副支队长，杨永德任参谋长，继续在平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

支队成立时，曾国华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强调三点：一是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爱人民，恨敌人；二是发扬“红五团”的作风，战必胜，攻必克；三是严守部队的纪律，听指挥，讲团结。

1938年1月，曾国华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决定在临近石家庄地区对敌进行一次袭击，以惊扰敌人，振奋民心。五支队以迅猛的动作，突然袭击日寇把守的井陘煤矿，歼敌一部。由于井陘距石家庄仅数十里，又是河北的主要煤炭基地，这次袭击虽然直接战果不大，但日军在眼皮底下被捅了一把，大为震惊。五支队也因之名声大噪。

3月间，五支队执行护送任务返回途中，发现平山、井陘公路上不断有日寇车辆通过。曾国华向干部们说：五支队不允许放过一次歼敌的机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不准放走一个鬼子。他立即下令在平定、昔阳附近一处山地环绕的狭路口设伏，当敌人由太原驶往石家庄的16辆汽车经过时，曾国华一声令下，打得鬼子东逃西窜，有的藏到汽车底下，有的跑到老百姓家里。这一仗除少数鬼子逃跑，其余全部被歼，缴获大批物资，唯有16辆汽车不能带走，只好就地烧掉。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与兰陵

古朗

兰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数百年来屡禁而不绝，影响之浩大，在其思想和艺术生命力被文学理论界视为与《红楼梦》价值等身。就《金瓶梅》而言，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公开评价《金瓶梅》，称其是一本好书，“不可不看”。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郑振铎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崇禎本《金瓶梅》插图

如此之旷世之作，它竟与兰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这部辉煌而不朽巨著的作者竟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至今这个谜底尚未解开，乃至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一书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它确定无疑与兰陵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兰陵自公元前256年楚国设县始名，经过2200多年的发展演进，已经不是单纯地理行政区划概念，重要的是融入了以荀子思想为精髓的儒家文化、兰陵美酒文化、兰陵运河文化等文化诸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色鲜明、内涵丰厚的符号与标识。不论兰陵笑笑生是谁，关键是他署名中嵌进具有“圣地”之称的“兰陵”一词。使得《金瓶梅》与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了特定的方向与意蕴。

笔者作为一名本土地方史志工作者，这里不必执意探究兰陵笑笑生的身世之谜和对《金瓶梅》的“两性”（思想性、艺术性）评判，只取“金学”专家们关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与兰陵”的探析之倪端。或许从以下几个方面会给人启迪与认知：

一、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兰陵

明末，《金瓶梅》横空出世，自此，该书作者兰陵笑笑生伴随而来成为金学研究难以揭开的谜底。不过“金书”署名仅仅“笑笑生”三个字的话，有可能引不起古今文学理论界笑笑生是山东或兰陵（包括峯城）人的纷争。然而，笑笑生之前镶嵌“兰陵”二字，《金瓶梅》或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必然联系不能不成为关注兰陵文化的方家学者们的焦点和心结。

临沂大学已故教授、著名作家王汝涛在《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苍山兰陵》（以下简称《兰陵》）一文中强调：兰陵笑笑生就是兰陵笑笑生，不必拉大小名仕来充数；笑笑生是兰陵人。王先生在《金瓶梅作者考》《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专著中，均以大量的论证资料，认定“金书”与兰陵的关联。尤其是《兰陵》一文在《临沂师专学报》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南开大学教授朱一玄，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贵，泰山学者、研究员周郢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对《兰陵》中的观点给予充分肯定或认可。

徐州教育学院教授张远芬先生，根据书中的方言、俚语、自然与生态特色、地方特征以及作者生平身份、阅历等相关资料，经过综合考证，发表了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兰陵（峯县）文豪贾三近。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和肯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致信张远芬称赞：“已拜读全文（指《金瓶梅新证》），我想您的说法完全可信。这个公案得到初步解决，可息四百年来之争。”台湾著名学者马森认为：张远芬所考证的贾三近的生平事迹，以及宦游处所，人生经历、习脾嗜好、著作目录等，使人觉得兰陵的贾三近实在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一个人物。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于2014年“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认真研究荀子和研读《荀子》32篇，就会发现《金瓶梅》与前者的文脉相承。《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兰陵令荀子的好学生，能够把荀子的‘性恶说’阐发地最深刻、最生动地莫过于《金瓶梅》。”黄霖先生的这一表述，充分强调了“兰陵令”荀子这位先秦“后圣”和明代文学巨擘“兰陵笑笑生”的兰陵渊源。这对于关于兰陵笑笑生的本名迄今已有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等等又入木三分。

这些年来，关注《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的本土专家学者，他们对“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兰陵”的呼声推向新高：兰陵籍学者、江苏师大教授孙天胜

撰文“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的提法，本土专家刘开《金瓶梅与鲁南方言》、焦子栋《圣地后的媚魅二影》、王毓久《金瓶梅作者之我见》等等，均从不同角度阐发或论证了《金瓶梅》和作者兰陵笑笑生根植兰陵的事实。

二、让兰陵笑笑生回归兰陵的缘由

如今在笔者看来，兰陵笑笑生既是一位创造文学巨著的伟大工匠，400年来又被演变成一个历史文学形象。让他回归兰陵，从《金瓶梅》中可以找到以下最基本的缘由：

一是《金瓶梅》中的鲁南人文地标。人文地标代表着一块地域的积淀，流淌着千百年文化的热血。不仅是一处美景名片，更是人文精神的凝聚。兰陵县地处鲁南苏北交界地带，境内河道如沂河、沭河等皆为古运河邗沟的北延，现在叫做中运河水系。邗沟又通过长江又与江南运河网系联通，再加上春秋时越灭吴，战国时楚又灭越，故在战国晚期，楚国兰陵已可以通过水路与江南吴越之地发生诸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北方陆路与南方水路的交汇点与承接点，是一处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春秋时吴、越二国北上中原争雄称霸，南朝时刘裕北伐皆以兰陵之地为桥头堡。隋唐大运河及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更让兰陵的交流交通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上海政法学院孙超教授在《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一文指出：“《金瓶梅》中的‘山东清河’是座幻城，‘山东运河’亦是一条艺术写实之河；而山东兰陵作为文化素不仅有来自《金瓶梅》文本的大量依据，更重要的，它是笑笑生情有独钟的寄寓诗魂之地。为深刻理解《金瓶梅》的文学特性与其文化母体之关系，我们应该重视对其文化素的考察。”笔者亦认同，自从欣欣子透露出是“兰陵笑笑生”创作了《金瓶梅》，透过这一化名去揭开作者真面目的考索就没有停止过。从文化素的角度言，兰陵最早始于战国时期楚国所设“兰陵县”。早期的“山东兰陵”文化是齐鲁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融合的结晶。两汉以迄明清，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运河文化在“山东兰陵”交汇，使其成为一个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域。笑笑生作为“兰陵人”，深受这一文化的濡染，而《金瓶梅》多种方言、多地民俗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正肇基于此。

史书记载，兰陵作为郡望之地，自战国以来几乎生生不息，作为行政区划或人文地标屹立不衰，滋润着一片文化绿洲。

二是《金瓶梅》中的兰陵风情民俗。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强调：“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这几门姐妹科学一样，都是近代产物。”被视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在考察了当时社会风俗、习惯后，写出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民俗事象。正如评论家张竹坡所说：《金瓶梅》是一部形象化的嘉靖、万历史，一幅明朝中叶的人情风俗图，这就是《金瓶梅》的价值。

临沂大学教授曲文军撰文《“金瓶梅”鲁南民俗考证六题》认为：在《金瓶梅》的作者尚未有最终定论之前，从作品中的民俗资料入手进行钩沉探索，不失为破解作者籍贯之谜的重要方法之一。作者对《金瓶梅》中的“埋衣胞、四色礼、破孝、打瓜子、靠山桌面儿、鳖棋儿”六则民俗内容进行了考证。

比如：《金瓶梅》第30回曰：“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脐带，埋毕衣胞，熬了些定心汤，打发李瓶儿吃了。”“衣胞”是指母体内包裹婴儿的胎盘。鲁南人处理衣胞的方式，正是兰陵笑笑生所写的“埋”。而临沂地区男孩的胎衣一般埋在磨盘底下，女孩胎衣埋在栏圈里。“四色礼”，临沂人在定亲或至亲应酬交往中，往往用“规格”较高的“四色礼”。《沂蒙文化发展研究·沂蒙民俗》曰：“鸡、鱼、肉、

粉皮”称之为“四色礼”。《金瓶梅》第63回：“爹又使他跟贲四换绢去了。嫌绢不好，要换六钱一匹的破孝。”“破孝”实际上是丧主与亲友们共同参与的行为。在临邳、兰陵一带，至今仍有破孝的习俗。《金瓶梅》第24回：“宋蕙莲正和玉箫、小玉在后边院子里挝子儿，赌打瓜子，顽成一块。那小玉把玉箫骑在底下，笑骂道：‘贼淫妇，输了瓜子，不教我打’。”“打瓜子”是鲁南民俗中游戏，具体实施程式：赢者一手拉过输者的手，攥其四指，仅露出手掌和手心，然后赢者用另一只手拍打输者的手掌，又称之为“打瓜儿”。举凡儿童有输赢的嬉戏、弈棋等活动，常以打瓜子“惩罚”输者。《金瓶梅》第80回，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等七人凑七钱银子摆祭礼，除了得到二尺孝绢之外，“到明出殡山头，饶饱食一顿，每人还得半张靠山桌面儿来家，与老婆孩子吃著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靠山桌面儿”即鲁南人喜爱的面食——锅饼。在临沂、兰陵一带，锅饼有着固定的规格和份量。一般五斤白面做一个，直径一尺二寸，厚一寸二分。一个锅饼要烤半个多小时。鲁南民俗，贺喜他人乔迁新居时亦可用锅饼。临沂至今仍有抱一个锅饼与人“温锅”的习俗。《金瓶梅》第83回：“一日，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敬济赏月饮酒，和春梅同下鳖棋儿。”“憋棋儿”又叫“憋死牛”或“憋死驴”。棋盘为“区”字形，“区”字右边两个锐角之间有一个圆圈，称之为“井”。被憋得无路可走的“牛”或“驴”只得跳井，称之为“老牛（驴）跳井。”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举。即此足以证明兰陵笑笑生是非常熟悉鲁南地区的风情民俗的，他应该是鲁南兰陵人。

三是《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方言色彩的小说，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金瓶梅》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熟稔地运用土语、谚语、歇后语等方言词汇，溶铸成“一篇市井的文字”。其语言在汉语发展史和白话小说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语言研究因之成为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兰陵本土学者王毓久《“金瓶梅”作者之我见——传说与档案的印证》一文，从《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等方面举证，强调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比如：《金瓶梅》中叙述摊煎饼，第一个煎饼因鏊子凉又新擦了油，便摊成了“滑塌子”。比如，第23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惠莲受了潘金莲的戏弄心中十分恼火，正巧狭路相逢遇着西门庆，惠莲道：“你好人儿，原来是个大滑答子货”。兰陵人引用于男女斗趣便说：“你这个滑塌子货”。这类语言，不吃煎饼的地方创造不出来，吃大米的江南绝对没有。“大滑答子”，是指烙第一张煎饼时，鏊子上的油不热，这张饼烙不好，只能放在一边，因此，叫“滑答子”，引申为骂人话，是指这个人不成器，没有能力。《金瓶梅》中类似的兰陵方言比比皆是：

1. 老鼠尾巴长疮，有脓也不多。
2. 远亲不如近邻。
3. 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尽各自的心。
4. 你来瞒我，我饶不了你。
5. 戏台底下掉眼泪，替古人担忧。
6. 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
7. 狗咬尿泡空欢喜。
8. 你躲滑儿，我偏不放过你。
9.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0.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11. 咸菜腌的苦不丁的咸。
12. 好心当成驴肝肺。
13. 你拿我煞气。
14. 一替两替，请他也不来。
15. 苍蝇不钻无缝的鸭蛋。
16. 随问谁也辩他不过。
17. 登时肚里生疼，煎汤吃下去。
18. 约有两顿饭时。
19. 见李瓶儿躺在床上，面色腊渣黄了。
20. 他屋里的丫头亲口说来，又不是俺们葬送他。
21. 往常家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来了。
22. 那日也该当有事。另外，还有一些这样的词语，如“趁”“着（将）”“捣”“投”“响”等等，在鲁南兰陵都有特殊的用法，而《金瓶梅》作者也常常用到。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母语，代表着一个地方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似乎告诉了什么呢？

四是《金瓶梅》中的兰陵饮食。真是“民以食为天”！《金瓶梅》好像是一本吃货指南，纵观全书一百回，真是每一回都有吃喝，但却不一定每一回都有性描写。比如《金瓶梅》开篇描写的两场饭局，颇具有代表性。比如：先是玉皇庙内西门庆十兄弟结拜：“不一时，吴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开，鸡鱼果品之类整理停当，具是大碗大盘摆下两桌。”可以看到，发迹前的西门庆结交的狐朋狗友，基本上张嘴不离吃喝，而且需要猪羊鸡肉等新鲜肉食加以辅佐，才称得上一顿。

在另一边，武大郎终于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武松，也是摆下一桌酒饭款待，吃的也“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武大郎仅仅是一个卖炊饼的小贩，财力上当当然无法和西门庆相比，但在吃的问题上，内容却是差不多的。

小说第二十二回描写了西门庆所吃的一顿早餐：“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

到了中午，吃法又是一变：“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的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煤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噶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煤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清华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鲟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干嘛都是入口即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

这些做法、吃法，吃相、菜肴几乎都是兰陵饮食文化的描摹、凸显或折射。

三、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成为必然

对于《金瓶梅》和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研究，欣慰的是让人看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冷静介入，平心攻关；客观的结果，初露倪端。笔者期待这样一个事实：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的必然！但也不会无比地牵强附会，到头来总得事出有因。

兰陵籍学者李汉举在《“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一书指出：“兰陵”作为地名，本来无需对其做出意义上的解读，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但是，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乡贯就和作者产生了联系，即这个地域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与作者产生了联系。不论这个联系的程度大小，都不能否认作者与这个地域的思想文化有了血脉牵扯。作家的创作是其思想文化的体现和表达，而作家又会受到其生存地域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这个地域的思想文化就会通过作家这个媒介影响到他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兰陵”也就与《金瓶梅》有了思想文化的联系，或者说“兰陵”的思想文化就会在《金瓶梅》中有所体现和反映。因此，“兰陵”也就有了意义解读的可能。这种解读的可能，对于神秘莫测的笑笑生及其《金瓶梅》来说，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在认定“兰陵”地域概念的前提下，展开思想文化上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把两类对“兰陵”的解读结合起来，才会得出更加合理的阐释。以这样的思路再反观兰陵寓指之意义，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容易理解得多。

笔者以为，以上李汉举博士的这段精辟阐述，不是一种个人感情色彩的流露，而是一位学人的客观评述。并且这种观点与张远芬教授的睿智、王鼎钧先生的卓识相得益彰。

张远芬教授《兰陵笑笑生，笑在“论语”中》一段文字意味深长：

我想，一个作家写出一部《金瓶梅》这样的伟大作品，他是不想让当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但一定又想让后人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必然心理。于是，他（贾三

近)就把“兰陵笑笑生”分别藏在不同的典籍中,以求后人能破解出来。在他所写的《峄县志序》中,藏著“兰陵”,在他所写的《于氏家藏诗略序》中,藏著“生”。那么,“笑笑”二字又藏在哪儿呢?……诚如王鼎钧先生所说,“也许有一天,有某一本古书、某一件文物,上面赫然大书‘贾三近别署兰陵笑笑生’。我们得承认这几乎不可能。”鼎公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只找到了“笑笑”的下半截“天天”,上半截的“竹”字头还未找到。我愿听鼎公的话,暂且罢手,不再追究下去。因此,我只能说“天天”就是“笑笑”,也算完成了对“兰陵笑笑生”的考证。

张远芬先生这段提到王鼎钧谈《金瓶梅》名字的文字,除了中肯、自信、平和、刚毅,还充满着一种期待。

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兰陵籍著名海外世界华文作家王鼎钧先生在《贾三近与金瓶梅》中说:“由于《金瓶梅》内容特殊,作者设法隐藏自己无所不用其极,‘败露’的机会太小了!谁也不敢保证贾三近就是兰陵笑笑生,但是谁也不能断定绝对不是。《金瓶梅》的作者已有十七个之多,大家都没有积极证据,那么,有情况证据者优于无情况证据者(说王世贞因复仇而作《金瓶梅》,就连一点情况证据都没有),情况证据多者优于情况证据少者。现在是贾三近的情况证据最多。”

而且王鼎钧在回忆录《昨天的云》中写道:“现在,兰陵人有一大意外收获,那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本来被人视为‘低俗’的‘淫书’,若干年来身价蒸蒸日上,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也最大的自然主义小说,了不起;又有人说,它的妙谛在文字之外,禅境高深。一部小说禁得起批评家用写实和象征两个不同的角度钻研探讨,也只有对他的作者虚席以待了。”

鼎公精深言论,情之兰陵,亦回应了张远芬教授,阐明了他的远见:不管今后能否考证出兰陵笑笑生的真名实姓,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笑笑生之系名将永载中国文学创作的光辉史册,“兰陵笑笑生”永远与山东兰陵人结缘,永远是兰陵人值得骄傲的一位文学大家。

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结论:《金瓶梅》虽然历来充满争议,不论是其文本本身与兰陵的密连,还是作者兰陵笑笑生与兰陵的渊源,都无法否定《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厚的兰陵历史文化内涵的大书,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

落叶总有归根时,不揭秘底为渊源。作为兰陵人,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成为必然。



历史上的王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吗？

孙振奎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写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大都督曹真率军迎敌，军师王朗自逞其能，说他用一席话，就能够让诸葛亮“拱手而降”。结果这话倒是说了，可不但没有说得诸葛亮投降，反而被诸葛亮大骂一顿，以至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深远，王朗之死又是以回目出现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王朗之死就是被诸葛亮骂死的。

其实，历史上的王朗并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么，王朗是怎么死的？在王朗的性格当中，有可能被人骂一顿就会“气满胸膛”而死吗？还有，小说为什么会写成王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呢？



王朗（左）与曹真
（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王朗的大致经历

王朗字景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北）人。早年担任过菑丘县长，后在陶谦手下担任治中。在徐州时，王朗和别驾赵昱等人劝说陶谦拥戴天子，陶谦派赵昱到了长安，皇帝于是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郡太守，王朗为会稽郡太守。

孙策渡过长江攻占江北土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兵力不足以拒敌，不如避敌不战。王朗认为自己身为汉朝官吏，应该保守城镇，于是发兵和孙策作战，战败后，渡江到了东冶。孙策又来追击，王朗再次大败。王朗去见孙策，孙策因为王朗风度儒雅，只是诘问责难了一番而没有杀他。

曹操上表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出发，辗转于江海之间，奔波了一年多才到达。朝廷任命王朗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刚建立时，王朗以军祭酒的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后又升迁为少府、奉常、大理卿。

曹丕时期，王朗担任御史大夫，后改任司空，到魏明帝时由司空改任司徒，直到去世。

王朗的经学成就名冠一时，被称之为“王学”。除此之外，王朗在司法、行政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善于处理诉讼案件，主张疑罪从轻。可别小看了这个“疑罪从轻”，在“有罪推定”的古代，它的进步意义非常大。劝谏曹丕减少游猎和伐吴，建议曹丕和曹叡减徭薄赋，发展生产。在军事方面，王朗的表现主要是献计决策，如吴、蜀夷陵之战时，王朗认为应该首先坐观胜败，到形势明朗时再出兵，一旦出兵则一战成功，不留后患。为曹丕所采纳。

王朗有可能被骂致死吗？

从王朗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和诸葛亮并没有接触过，那么，从他的性格特征上来说，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气满胸膛”而死呢？看一看他和曹操的一番对话就可以得知。曹操曾经请王朗赴宴，宴席上嘲讽他说：“不能效法你当年在会稽那样丢了好米饭碗。”王朗仰头叹息，说：“事情应该适当却难在做到恰到好处（宜适难值）。”这句话似乎和曹操的话有点儿不接茬，于是曹操问：“这话怎么说？”王朗回答说：“像我那样，当年既为汉吏，应该是保境安民，不应该改变自己的（气节）而实际上改变了（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像明公您今天在这个场合，原本应当体现出恭敬好客，折节求贤的气度，结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该折而不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所以说，这适度实在是太难了！”潜台词是：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东吴有国，孙坚打下了根基，但这地域却是孙策一城一地攻打下来的，江南很多比王朗有势力的太守都败在了孙策手下。按理说，军事方面不是王朗的强项，王朗败在这样一个人手里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古人把气节看得很重，投降孙策毕竟是王朗一生经历上的一个污点。你曹操以皇帝的名义把人家召来，人家被扣一年，就是不当孙权的官吏而一心来投奔你，你曹操是完全应该折尊礼贤，给王朗更多尊重的。事情恰恰相反，曹操偏偏在广庭大众面前揭王朗的伤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要么表现得“怒火填胸”，要么就是“甩袖而去”，又或者是“献媚自嘲”，但王朗却表现的不卑不亢。王朗在用一句话过渡之后，巧妙地指出曹操的“无礼”，既避免了自己的尴尬，又使事情圆满收场，可以说是思路清晰，机智冷静。从这件事的情节上来看，

王朗不是一个无端生气之人，因而也就不会出现被人一骂就会“气满胸膛”而死的人。

王朗被诸葛亮骂死的创作依据是什么？

问题是，《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为什么要把王朗之死说成是被诸葛亮骂死的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说成其他人被诸葛亮骂死？比如说那个辛毗，他可是真正到西部魏军当过军师，和诸葛亮对垒，节制司马懿对诸葛亮长期采取守势之人啊。仔细想来应该有两个原因：

一是小说中王朗之死和真正的死亡时间比较接近。

诸葛亮初次北伐是在公元228年，这一年是蜀汉建兴六年，魏国太和二年，正是王朗死亡的年份。王朗应该是正常死亡，也就是死亡本身没有什么特别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让他死在和诸葛亮的骂战之中，不容易引起后人诘难。同时，诸葛亮以后还有多次北伐，小说要写到魏国的人和事甚多，尤其是魏国朝廷高官，是很难完全避开的。既然真实的王朗已经死亡，这个人不再出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诸葛亮还真的对王朗有过评价。

尽管诸葛亮和王朗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但诸葛亮的言论当中，还真的涉及过这个人。诸葛亮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有州郡，但他们只会高谈阔论，动不动就引经据典，搬出一个圣人来作为自己的依据，而他们的心里却总是一些怀疑和困难。在这样一个争战的年代，两人今年不战，明年也不战，最终导致孙策逐渐发展壮大，让他通过兼并完全据有了江东。”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诸葛亮眼里，王朗只是一个理论上有一套，并没有干实事能力的人，这样的人遇到孙策这样一代枭雄，只能是被人兼并。纵观王朗一生，这样一个看法基本是正确的。诸葛亮北伐，打的是复兴汉室的口号，让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死于骂战之中，既体现了诸葛亮的“能言善辩”，又体现了诸葛亮出师北伐的“正当正义”，可谓是一举两得。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骂王朗，也突出了“折节”一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气节的重视。王朗一生对文化对司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因为曾经的“折节”被曹操嘲讽，后世又被小说家贬损，也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琅琊”还是“琅邪”？

——琅琊字形考

高雷

琅琊，临沂之古称。无论是作为历史坐标，还是文化符号，厥功甚伟，其德永馨，至今仍为本土引以自豪而乐道。

“琅琊”还是“琅邪”？天下本无事，然地域不同，嫡庶之争，各自标榜；时间推移，语言演变，多有差异。

琅的本字为“良”，甲骨文作“𠂔”。邪的本字为牙，还没有发现有甲骨文的字形，西周金文作“𠂔”。所以在西周时期，琅琊的文字形态应该是“良牙”。

遗憾的是，至今未有发现西周有琅琊地名的文字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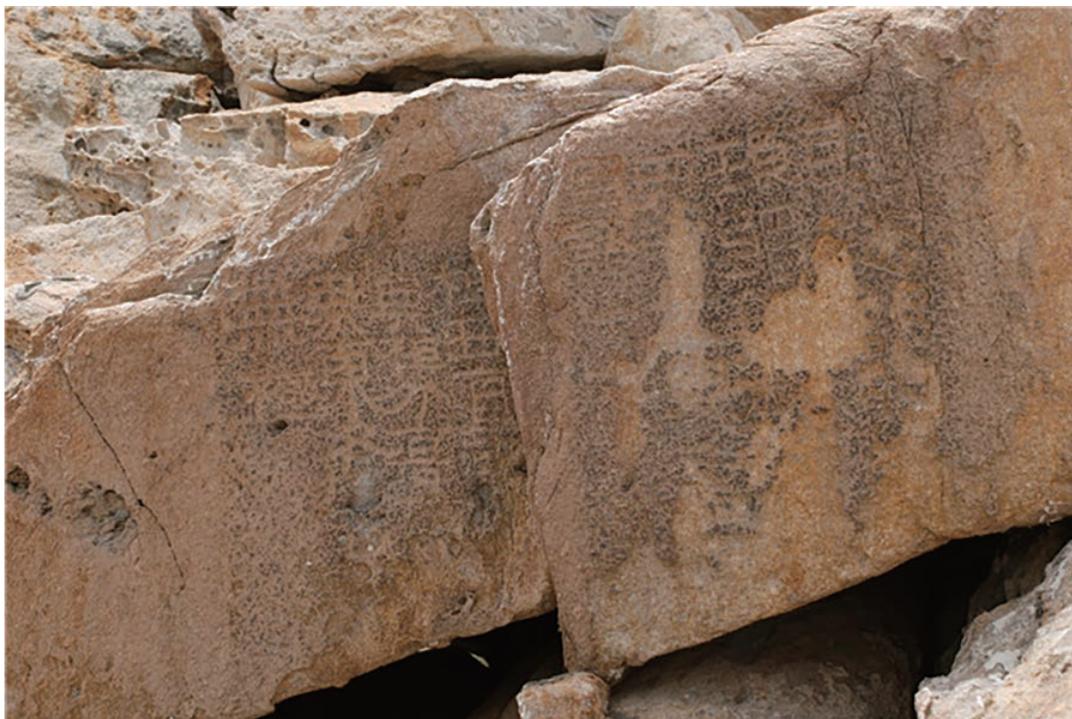
现存最早的文献中提及琅琊的有《战国策·苏秦为赵合从》。内中说：“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当然此时的琅琊字形，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琅邪”。

比如邪字至少有两种写法，一为战国玺印中的“𠂔”，二是云梦《语书》中的“𠂔”。提及琅琊地名的还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晏子春秋》等。其中琅琊的写法需要等待出土文献的发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首设琅琊郡，郡址位于今青岛市黄岛泊里镇和琅琊镇之间，面积约20平方公里。秦朝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琅琊，加筑琅琊台。并在台上“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内有“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之句，从现存的断碑残碣上可以看出字体是秦朝通行的小篆。

汉承秦制，西汉沿袭了琅琊郡的设置。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历四月，琅琊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北海琅邪坏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琅琊郡治迁移到东武（今诸城）。此时琅琊字体已由篆变隶。连云港市连云区现存西汉界域刻石共有两处，根据现有文献材料考证，该二刻石为王莽时期东海郡与琅琊郡的界域刻石，内容涉及西汉时期琅琊郡的柜县和东海郡的胸县等地名。字体变化如图：



东汉建元，改琅琊郡为琅琊国。《后汉》书载：“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公元15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京性恭孝，好经学，显宗（刘庄）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昌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五年，乃就国。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官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官开阳，以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临沂，肃宗许之。立三十一年薨，葬东海即丘广平亭，有诏割亭属开阳。”这就是今临沂称为琅琊的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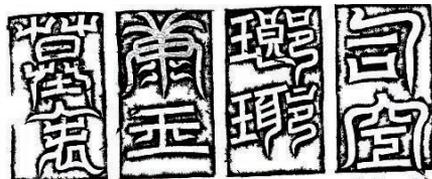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刘京后嗣刘熙背叛曹操，被诛，琅琊国除名。

这个时期，琅琊出现了两种写法，一是“琅邪”，一是“琅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邪”说：“邪，琅邪郡也。从邑、牙声。”清代小学大家段玉裁注曰：“邪”读音为“以遮切”（读作yé）。“琅琊”的初文为“琅邪”。“按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俗字也”。段玉裁解释的意思：“琅邪”是古体，“琅琊”是白话。

司马氏篡魏，三国归晋，重置琅琊国。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丁卯，晋武帝封司马伦为琅琊王。三年（公元267年）八月癸亥，徙东莞王司马伷为琅琊王。琅琊王司马伷死，子司马覲嗣位。覲薨，覲子司马睿嗣位。

永嘉南渡，司马睿登基后为南渡士族侨置琅琊郡，史称南琅琊。两晋时期的出土墓志中，地名琅琊与琅邪均有出现，互不排斥。

南北朝时期，天昏地暗。文字使用比较混乱，单个隶、楷书字形中出现古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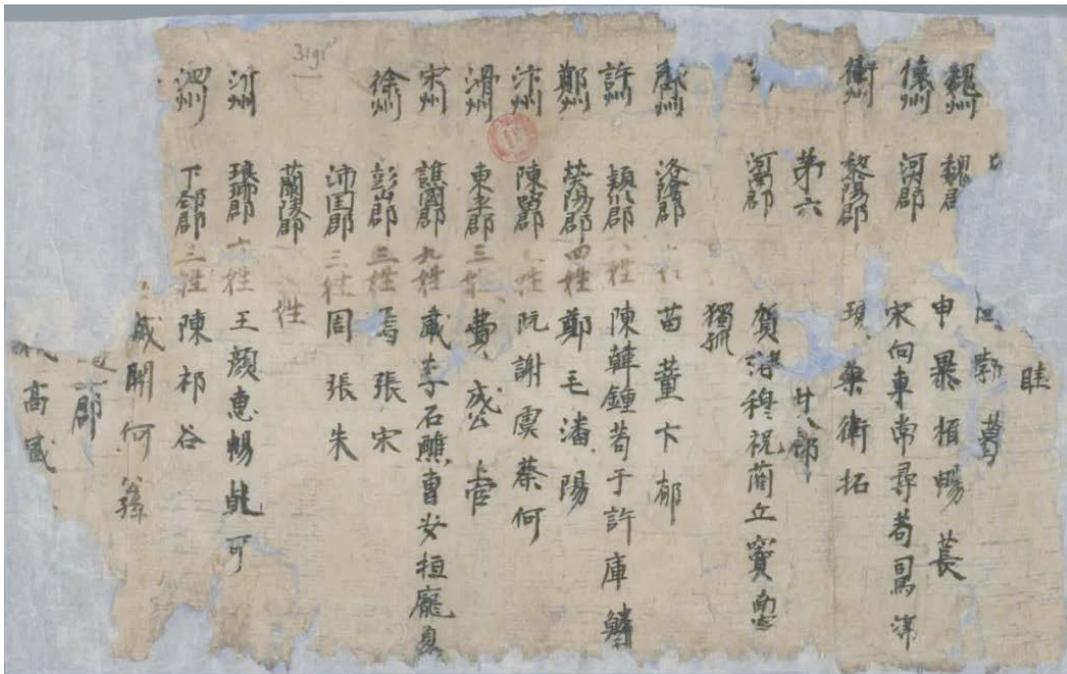


龍瑯真將持縣酉庫歲雞
之瑯司軍節肥代午在大
銘康空吏侍鄉故羽甲代
王集部中孝河十子太
司州尚鎮敬內六十和
馬判書西里郡日一八
史羽大使溫一月季

探索发现

同构件并存的现象。琅琊的琅写作“瑯”，琊写作“耶”“琊”的并不少见，如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志中的写法。

大唐一统，武德四年，在今临沂市置沂州。天宝元年，改为琅琊郡。乾元元年，复为沂州。此后沂州、琅琊成为临沂的地望名词。从现存唐代写本中，可以看出当时琅琊的写法依然落英缤纷，但“邪”字已经不见了踪影，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语言现象。字体也由隶书演变为规范的楷书。



唐代写本《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清朝入主中原，大兴文字狱，文人骚客不得已躲进故纸堆里，校勘、注疏，“琅邪”写法又死灰复燃。甚至还出现了“琅琊”还是“琅邪”之争。

然而，语言有其历时性的，有其发展演变的脉络，不同时代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老的正在死去，新的不断产生。时至今天，要求语言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现代汉语严格地规范了地名琅琊的写法，大江南北一律厘定为“琅琊”，而“琅邪”已成为了历史。今天，你写对了没有？



沂蒙山深处的“小三线”

李 强 傅家德 王铭泽 公 艳

居安思危，勿忘国防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军工企业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三线”成为那个年代特殊的符号，“三线”军工企业的建设、发展的历史，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历史缩影。

1964年5月之后，苏、美从北部、东部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当时，我国的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东部沿海一带，形势十分紧迫。

面对空前紧张的战备形势，毛主席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山区成为首选。

中央决定将全国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划为“一线”“二线”和“三线”，重点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山区的“三线”地域。与此同时，中央要求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在隐蔽地带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小三线”由各省国防工办领导，主要生产常规武器，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抵抗。地处沿海的山东省将沂蒙山区选作建设



民丰机械厂厂区

“小三线”地点。

巍巍八百里沂蒙，固险岭峻，峰峦连绵，素有“四塞之固、舟车不通”之说，位置隐蔽，岩层适于凿洞，是军工企业理想的选址地点。在确定建设“小三线”之后，一声令下，数万人马奔赴沂蒙山区。

“好人好马上三线”

山东的“三线”企业主要分布在沂蒙山区的沂源、蒙阴、沂水县境内，企业名称都有两个，对外称名字，对内称代号。1966年至1986年期间山东的军工企业（简称和代号见括号注释）主要有：

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土门一厂，976）、山东第二机械修配厂（土门二厂，945）、山东前进配件厂（前进厂，9426）、山东机械修理厂（机修厂，9439）、山东工模具厂（工模具厂，9429）、山东光明机器厂（光明厂，9347）、山东化工厂（山化，234）、山东机器厂（732）、山东红旗机械厂（红旗厂，5823）、山东民丰机械厂（民丰厂，9381）、山东新华翻砂厂（新华厂，9363）、山东裕华修配厂（9354）、山东鲁光化工厂（鲁光厂，802）、山东红光化工厂（红光厂，5824）、泰山厂（5808）。此外，还有军工医院（因建在蒙阴县岱崮镇，称为岱崮新建医院）、山东国防工业计量站（军工计量站）。

各厂都有自己的生产任务，形成相对互相配套的模式。土门一厂生产步枪、冲锋枪，土门二厂生产子弹，机修厂生产手枪，光明厂生产八二无后座力炮，红旗厂生产四零火箭筒，新华厂生产多种型号的迫击炮弹，裕华厂生产底火和导火索，山东机器厂生产反坦克地雷，鲁光厂生产烈性炸药黑索金，前进厂生产12.7毫米高射机枪，泰山厂生产显微镜和瞄准镜，民丰厂生产12.7毫米和14.5毫米的高射机枪穿甲燃烧弹和曳光弹。工模具厂起初主要生产专用刀、夹、量、模具和轻武器模锻件，为省内十几个军工厂提供工艺装备和产品锻件毛坯，70年代主要生产65式14.5毫米四联高射机枪，该装备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境内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山崮，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又是革命老区，具有深厚的革命积淀和群众基础，成为山东省“小三线”建设的绝佳地点。

省国防工办经勘查论证，将六所新建军工企业、一所军工医院落户蒙阴，即民丰厂、光明厂、工模具厂、泰山厂、鲁光厂、电讯四厂和岱崮新建医院。各厂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但年轻的新工人主要来自本省济南、青岛、烟台和临沂。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政委、指导员等政工干部都来自于军队；行政和技术干部来自于地方。在那个年代，能到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国防军工企业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时称“好人好马上三线”。

当时中苏关系还比较紧张，毛泽东主席讲：“三线一天建设不好，我就睡不好觉”，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本着这个号召，三线建设速度很快。1965—1971年，落户于蒙阴县的三线军工厂相继建成。鲁光厂1966年8月开始建设，位于旧寨乡北楼村。初名蒙阴化肥厂，1967年12月改称山东802厂，1971年9月改称国营鲁光化工厂，1979年4月改称国营山东鲁光化工厂。工模具厂位于岱崮镇东，于1965年11月开始建设。民丰厂于1965年8月勘察兴建，1966年3月建成，位于岱崮镇筑篱坪村。光明厂位于坦埠镇新建村，1966年6月开始建设。泰山厂（中央部属军工企业），1971年5月建于野店镇朱家坡村北，1981年改称国营山东光学仪器厂。电讯四厂1971年春建成，位于县城西南东汶河南岸。

民丰厂是山东“小三线”建设的一面旗帜，各项建设走在了军工企业的前列，其产品填补了山东军工产品的空白。建厂时，实现了当年批复、当年设计、当年建厂、当年投产。曾荣获过“大庆式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技术水平上，该厂也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弹壳磷化电泳涂漆工艺获得了当时省科技进步奖；改进曳光管引燃剂配方受到了当时省委和省革委的奖励，并在全国推广。曾涌现出了党的十大代表刘芳、全国“学大庆铁人标兵”李在业等先模人物。

为求隐蔽，民丰厂的房子和车间都建在山峪间沟洼低矮之处。宿舍建在北山，刚开始盖了很多草房子，伪装得就像老百姓房子一样。通信地址是山东泰安第8号邮政信箱。当时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是很强大的，大家没白没黑的工作，工作劲头很足。当时打了3个山洞，利用了2个，山洞现在保存完好。民丰厂的技术力量主要来源于四川“大三线451厂”和东北“大三线321厂”，领导班子基本是青岛来的骨干，之后又从当地退伍军人中招了部分，这些退伍军人分布在蒙阴、沂南的周边县区。第一任厂长是吕华林（来自青岛，后调到济南，担任省药材公司经理），书记是王书翰（来自淄博张店区，后调回淄博），副书记是张燃（青岛市人民银行调来，后调到济南新华红光厂）。

那时军民工农关系特别好，和谐相处，就像口号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笊篱坪村麦子种得少，产量也低，逢年过节，民丰职工省出面来，让村民吃上一顿饺子。

民丰激情燃烧的岁月

民丰厂最鼎盛时期是在1966—1980年。曾拥有职工近2000人。当时民丰厂是正县级单位，厂级干部都是县团级。厂机构设置健全，有技术科、动力科、后勤科、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等，各部门人员很多。后勤机构齐全，有子弟学校，食堂、澡堂、代销店、招待所、幼儿园、理发室、车队、银行、粮店、邮局等。大的车间有5个：一、二、三、四、五车间，车间工人100人至200人不一。建厂初期，车间实行军事化管理，称之为连队，设指导员；后改为车间，有车间主任、副主任、设分管工会的领导。

那时民丰厂是军工企业“学大庆”典型，山东“小三线”军工厂开会、举办活动都在这里。各级首长经常来视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省领导陈建国、袁升平曾来过，中央文工团来民丰厂演出慰问过。外国客人也来过，那些年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客人到这里来，不用找翻译，民丰厂人才济济，厂里有会英语的当翻译。

厂干部由省里统一管理，调动很频繁，调走后很多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子弟学校老师邢德茂被调到省军工局工作，以后挂职菏泽地区副专员，后出任山东省商检局局长（正厅级）。王可志、邢万茂、姜竹青先后被调省军工局、省财政厅工作。杨乐家先是出任省机械厅副厅长，后又调青岛外贸公司出任总经理。还有不少学校老师、财务人员被调至省内各高校做教学工作，有的晋升了副教授、教授等。许多技术人员从厂调到各地后，成为当地的技术骨干和拔尖人才。

厂里经常放电影，一星期有时放两场。有新片子民丰厂先看，然后再去其他三线厂放映。当时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周边村队群众都来看电影。老百姓翻山越岭来看电影，都带着手电筒，看完电影后再翻山回家。那时的电影没有彩色的，全是黑白片，但很清晰。放映队很忙，来来往往巡回放映。一有星期天就跑，这厂演了赶紧走，再到那个厂演，一晚上演好几场电影，一连跑好几个三线厂。放完了第一卷，马上送到别的三线厂。“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放的次数最多，百看不厌。



民丰机械厂生产
车间一角

一过节厂里热闹非凡，经常举行篮球友谊比赛，蒙阴当地的球队都来参加比赛，有蒙阴一中等篮球队以及各厂矿企业（含三线）球队参赛。过国庆节，就拉出高射机枪，支好架子，“咔咔”打枪进行庆祝。

从建厂开始有一支100多人的驻厂部队驻扎在公家庄，省军工局派员在这里验收成品。周一、三、五打靶，军代表必须在一边看着打，靶场就在南山里，靶板是两厘米厚的钢板，有距离50米、100米、500米靶道。枪架子形状就像摄像机，装上子弹就可以射击，靶道那头就检验打了多少发，有多少飞弹、多少打在钢板上没打透的。钢板都在靶屋里吊着，“腾腾”作响，颗颗能穿透并燃烧。军代表验收产品合格，然后盖上章才能出厂。

曲折重生路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小三线”军工产品在战场上派上了大用场。当时民丰厂的子弹直接送上前线。随着局势的缓和，上级逐渐减少了军品生产任务，到1984年，整个“小三线”基本停止了军品生产。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家从战略布局上的考量，也有军工企业自身的原因。国家层面上，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而建设在边远山区的大、小“三线”企业发展的弊端却日渐明显，这时国家开始有意压减军品生产任务，有的军工企业则率先开始了生产民品的尝试。军工企业自身的原因主要是产品的先进性和质量问题。例如军工厂生产的机枪弹对两厘米的装甲能穿透，以后装甲增厚成了三四厘米的，打不透了。以前飞机飞1000米高能打到，现在飞机能飞2000米高了，且飞速提高了，子弹够不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也有个别厂出的子弹，打着卡壳、不响的，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所有情况都得反馈回该厂，也暴露了一些质量问题。

“断奶”之后，蒙阴的“小三线”军工企业开始了艰难的“军转民”探索之路。其中转型最成功的，当属鲁光厂。

鲁光化工厂当时主产品为烈性炸药黑索金。1985年9月开始生产民用硝酸钠、亚

硝酸钠。到1987年，共生产硝酸钠2684吨，生产亚硝酸钠8041吨，产值536万元，实现税金63万元，亏损132万元。1987年，开始全面转产民用产品。此时改属临沂地区化工公司，有职工1141人。1992年，鲁光化工厂由蒙阴县的旧寨乡整体迁至临沂市罗庄区。从计划经济的温室中突然暴露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大环境，用什么技术、生产什么产品、如何选择市场，企业与职工四顾茫然，无所适从。从1992年搬迁至2004年的十多年间，鲁光一直在接连亏损和半开半停状态中度过。由于年年亏损，职工收入得不到保障。2006年，这个不足千人的企业已经负债17660万元，负债率高达394%，效益跌至建厂以来最低点。那一年12月，国务院下达了206户国有军工企业的政策性破产计划，鲁光化工名列其中。一个濒临破产的军工企业，职工面临生存的压力。人心涣散的危急关头，临沂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职工参股，市政府特地拿出3400万元垫资，在最困难时给予企业支持。2008年，改制后的第一年，鲁光化工实现产值1.8亿元，利税1507万元。短短几年间，企业由全国同行业规模企业倒数第一跨入前三名，成为行业领跑者，从2006年负债1.7亿元到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完成利税6000万元。经过全部职工的同舟共济，鲁光集团连续三年每年上缴税金超千万元，实现跨越式发展。时至今日，鲁光集团拥有资产30亿元，年销售收入35亿元，职工2600余人，各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公司拥有军工产品、无机化工、精细化工、食品添加剂、生态化肥、机械制造等多家子公司。公司已在临沂市经济开发区建有新的生产基地，拥有4大系列、20余种产品，企业实力雄厚，产能同行业全国第一，国际领先。

与鲁光厂的浴火重生不同的是，蒙阴县境内的其他军工企业则命运曲折。工模具厂1980年2月开始生产民用产品，至1987年，生产金象牌自行车近98万辆，锻件1770吨，工艺装备6400套，多功能高级病床1966张，非标准设备520台，完成民用产品总产值1.5亿元，实现利润324.26万元，税金1297万元。1987年改属临沂地区第一轻工业局，迁入临沂，尚有职工1169人。光明厂1980年开始生产民用品，主要有CM—500机动三轮车，至1987年，累计民用产品总产值4415.5万元，实现税金93.8万元，累计亏损145万元，1987年迁于泰安市，尚有职工1226人，改属泰安市机械电子工业公司。泰山厂早在1977年就开始生产民用产品，主要产品有照相机镜头、照相座机、教学投影仪、电动扳手、普通生物显微镜、实验室显微镜等。至1987年，累计民用产品总产值1397.5万元，实现税金20.8万元，亏损728.2万元，1987年迁入泰安市，尚有职工764人。电讯四厂自1976年开始生产民用产品，有BT201型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6厘米黑白投影电视机、PJ—60彩色大屏幕投影电视机等，至1984年共完成民用品产值170.81万元，1985年迁至临沂市。这些搬迁至临沂、泰安的企业，很多在搬迁中耗费了元气，有的技术骨干流失严重，军转民产品不适应市场，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有的搬迁后的设备就没再拆过箱，卖给了私人企业，有的则停工、破产。

民丰厂1979年开始生产民用品，先后研制过无门保险柜、啤酒罐，但是都没有成功，后确定生产自行车链条、电度表等。至1987年，累计生产薄片自行车链条25.7万条，JB7—2缝纫机上轴20.4万根，DD28型单相电度表51.46万只，电热褥7564床，完成民用产品总产值2297.6万元，实现税金42.4万元，亏损501.3万元。1987年，改属临沂地区一轻工业局管理。1991年9月，临沂地区行署派出工作组，将民丰厂一分为三，分出山东民丰机械厂（中一型企业）、山东民丰瓷厂（中一型企业）和山东轻工设备安装公司（中二型企业）等三家企业。民丰瓷厂和轻工安装公司随后搬到临沂，民丰机械厂一直到2001年才彻底搬完。

山东轻工设备安装公司于1997年3月与临沂天元集团强强联合，组建新的天元建设集团轻工安装公司，安装资质晋升一级。现为国家特一级资质，年产值达到3亿元

以上。山东民丰瓷厂1993年底搬迁临沂，因始终无法适应市场，1998年破产。山东民丰机械厂搬迁至临沂后，始终经营困难，2005年进行破产清算，企业破产。

在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沂蒙山区其他的“小三线”军工企业也多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命运。短短几十年，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个企业分崩离析了，其命运让人唏嘘，他们的辉煌亦如深山荒草里的厂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2012年，东蒙集团接手民丰旧厂址，开始了民丰厂的另一种“重生”之路。

经过悉心打造，山东民丰厂原驻地近日已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军工文化园”，这是继江南造船厂被命名后的第二个中国军工文化园。东蒙集团利用“三线”军工山洞建设而成的“三线军工博物馆”（岱崮地貌地质博物馆）展厅面积5600多平方米（尚有50%以上面积预备做为军工博物馆二期工程），博物馆内设军工展示区和展厅，岱崮地貌形成分布厅、地质地貌厅、崮乡资源厅、民俗风情厅，中华蜜桃第一镇、中国最美小镇等九大展厅。以神秘的军工洞穴为载体，地质地貌为核心，结合先进的专家技术设备，打造成国内最大洞穴式三线军工博物馆。以原大礼堂为依托改造而成的“三线军工大礼堂”集会议、演出、展览、放映功能为一体，既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又突出了上世纪70年代军工三线文化印记。礼堂内展示了上千张当年民丰人工作生活娱乐的旧照片，观后令人激动不已。在原河滩改造而成的“崮园——三线军工记忆”把历史与现实交融，设有“崮园大舞台”“三线军工记忆”等景点，成为该文化园的一大亮点。利用原民丰厂职工宿舍楼改建的“1970——田园公社”成为八方游客入住休息的住所，利用原民丰厂职工食堂餐厅改建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利用民丰厂原办公楼、文化楼、招待所改造的“三线军工旅社”更笑纳八方游客到此接受爱国教育、拓展训练、召开会议、旅游观光。中国岱崮三线军工文化园，以军工三线文化为载体，突出岱崮地质地貌文化，为游客的旅游休闲更添一份宁静，带给游客“梦回崮乡”的新颖体验。

民丰厂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了，它的重生，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2015年，民丰厂迎来了第50个生日。9月11日至13日，900余位曾经的老职工如同当年被选调入厂一般，应邀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举行了民丰50年亲情大聚会。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厂房，重现了当年的火热。

“小三线”在沂蒙山区从上世纪60年代建厂到90年代全线撤离，期间仅20余年，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三线”厂给驻地带来了基础设施、人才、技术以及税收，驻地也以质朴的民风、博大的胸怀、清秀的山水接纳和养育了“三线”儿女。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集全国之力建设的大、小“三线”，其贡献和意义是远远不能用经济指标衡量的。一代又一代的“三线人”建成的“三线”工程，大大震慑了其他大国觊觎年轻共和国的侵略野心，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也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三线”人展现出的奉献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正如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所说的那样，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产业强国的“三线”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财富。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

岱崮

本 编

“巍巍蒙山，七十二崮”，在蒙阴县东北部的群崮之中，有两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崮，这就是南、北岱崮。岱崮又叫望岱崮，因在崮顶能望见泰山而得名。南岱崮海拔709米，面积1平方公里；北岱崮海拔679米，面积2平方公里，两崮相距1500米，中间隔着一道小山梁。

据地质专家勘查，“崮”这种奇特山势形成于距今约5亿年前的古生代寒武纪浅海相沉积，经过漫长年代的浸蚀、溶蚀、重力崩塌和风化等多重地质作用形成。遍布沂蒙山区的这些态势奇特宛如古城堡式的崮，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岩石地貌，2007年被命名“岱崮地貌”。南北岱崮是群崮之一，崮顶四周是寒武纪巨厚石灰岩峭壁，蔚然壮观。

南北岱崮还是一座英雄的崮。1943年11月，八路军鲁中十一团八连为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坚守岱崮18昼夜，抗击了40余倍于八路军之日伪军的多次猖狂进攻，以伤7人亡2人的代价，换取了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的胜利。创造了八路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小型战斗之一。山东军区颁布嘉奖令、并授予八连“岱崮连”的光荣称号。1947年5月，解放军监护营一连又在此崮上与国民党3个整编师的主力血战42个昼夜，消灭近千名敌兵，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军委命名该连为“英勇顽强岱崮连”。现在，南北岱崮革命遗址成为山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见证。



消逝的莒国城墙

庞 岸

—

将近40年前，我在县城的一所学校里复习，准备高考。

在此之前，我在公社党委当一名农民通讯员，干了两年多，目的就是想弄到一个吃国库粮的“铁饭碗”；但看看确实也没有指望了，便听从了在县教育局



莒州城门楼

局工作的一个本家叔叔的劝告，走进了高考复习班。

这是县师范办的一个高考复习班。师范就坐落在莒县古城墙外的护城河边。到城里去便要翻过高高的残墙断壁，像翻过一个高高的小山包。那是一个干旱少雨的冬季，古城墙的缺口被人们已经踏出了一条土灰浮动的小路，在缺雨的冬季里，犹如踏在干石灰堆上。宽宽的古城墙下，错落而缺乏规则的民宅，在冬日的黄昏里，生出袅袅的炊烟，烟雾在暮霭里弥漫开来……望着这种景象，一种寂寞无度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冬日的阳光很明媚，明媚得让人想入非非；古文老师课讲得很认真，也很细腻，细腻地让人有“绿肥红瘦”的感觉。讲《诗经》，讲《左传》，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当然也讲“君子好逑”。有时候也出一点儿格，讲浮来山银杏树，鲁隐公某年在大树下与莒国国王会盟，讲公子小白避难莒国，讲乐毅伐莒，七七四十九日不下……讲到动情处，老师便会昂起头，眯起眼，微微摇晃着脑袋，沉浸在他的遐想氛围中。尤其是他讲到莒子在银杏树下与鲁隐公会盟，便生出无限自豪。似乎他就是当年的莒子，他不是在做故事，而是在追忆自己过去辉煌的历史。我们知道，莒子以一个子国的小国君主，能与一个大国的鲁国国王会盟，大国的君主不以自己的大国之尊而行几百里的路来到莒城边上与其会盟。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这都是一个小国的胜利。随着他那抑扬顿挫的音调，我的思想也常常脱缰，侧过脸看一眼校园外莒国的城墙，思想中一阵儿恍惚，便走进了历史的年代。

二

从老师的脸上移开，我的目光转向南窗，窗外不远处，高高的城墙便横亘在我的眼前了。

第一次认识城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季。那时我刚上初中，第一次去县城，是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去县城看革命样板戏。我是坐在体育老师的自行车前车架进入县城的。在那个交通工具短缺的年代里，老师要让他的自行车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在后车座上，还坐着一位女生。那是深冬，萧瑟的田野一眼可以看得很远。走过了沭河大桥不远，从稀疏的树林中就可以看到横亘在眼前的土丘。巍然肃穆，象一条僵卧着的黄龙，上面似乎还栽着什么果树之类。我问老师那是什么，老师说那是老城墙。我说，城墙怎么全是黄土？老师喉咙里嘟囔了一句，我没有听清。也许老师本来就说不清的。

七八年之后，我坐进了县城师范的教室，换一个角度看这城墙。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人们的创造力像压抑了很久的火山一样，想的就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富起来。因此，这偌大的城墙被砖瓦厂当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几家大的砖瓦厂日夜不停地烧制着砖块，而有的政府官员们也认为这城墙限制了县城的发展，任其利用。此时的城墙已经被看作发展的障碍了。城墙作为一项资源，一下子被人们发现了它的价值，而且这还可以一举数得，将城墙去掉，还可以为城市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何乐而不为？

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有许多愤激的想法。毕业几年了，在公社拼命地干，却最终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我心里充满着悲哀。我的潜意识里把这个城墙当成了扩大城乡差别的一个天然堡垒。我曾像鲁迅盼望雷锋塔的倒掉一样，企盼着这座城墙尽快倒掉。我还写过不少小诗，写城墙倒掉的意义。并为城墙的消逝而歌唱。但那些小诗后来也就像这城墙一样，灰飞烟灭了，它们也真的从我的记忆里消逝了。

回过头来看历史，才突然感到，有时候，历史原来也不过如此简单。灰飞烟灭是什么？莒国的城墙几年时间里便迅速消逝，就是一个例证。一座城墙，存在了几千年的城墙，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灰飞烟灭了。这是历史的无情，还是历史的有意？不过物质不灭，历史的古城墙变成了青砖红瓦，变成了农家小院，变成了城市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老城墙的黄土，不过变成了另外的一种物质，装点着另一个时空里的莒州大地。变成了另外的一道风景线。以此时的繁荣，来消蚀着古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写到这里，我的心不由颤栗起来，脑子里呈现出一片空白。

三

地处鲁东南蒙山东麓的莒国，沭水发孕于它的北部山区，经过它最富庶的平原地带，缓缓地向南流去，在进入苏北以后又向东流入大海。在莒国最为辉煌的时候，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为莒国所拥有。莒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后，分封诸侯。《重修莒志》载：“武王十有三年，封少昊之后兹于期于莒”。莒国的国都最早建在介根，本都计斤，在今胶州西南。因此，莒被认为是东夷。历史记载它的国君以好斗、奢杀而闻名。从周武王十三年到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被楚所灭，共经二十三代君主。事实上，真正有史料记载的是从周平王三十年，即鲁隐公二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莒国都城几经变更，但却缺少文字的记载。经过长年飘忽不定的游移，最后它选择了浮来山与屋楼山之间，沭河中上游这片冲积平原上。它的疆界北接齐国，南接琅琊郯国，西接鲁国，东到大海。古城就坐落在浮来山麓的沭河岸边。史料记载，莒国古城原与浮来山隔河相望。这一河之遥，使莒国城中之民对浮来山多了许多神秘。后来，1668年的一次大地震，使沭河改道。沧海桑田，莒国的城墙仍然坚强的存在下来，历尽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从春秋时期的莒国到清末一个州城，再到建国以后的一个县城，莒国的古城墙经历了辉煌与衰落。

《左传》记载，周“平王三十年，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指向国。关于向国，它在历史上位置很明确，春秋时，共有三个向国：一处在今河南境内，二处在今山东境内。《重修莒志》考，这里的向国，当在今莒南县大店镇的仕沟村一带。莒子娶向国女向姜，向姜嫁莒后，不安心在莒生活，经常住在娘家而不回莒，这使莒国君主感到很体面，于是莒人乘机灭掉向国。我们解读历史，可以这样来理解：莒定都以后，早就看中了身边更弱小的国家向国，把它做为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向姜常回娘家不过是一个理由罢了。如果向国在现在的莒南仕沟附近，离莒都不过30公里左右，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灭掉向国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罢了！“入向”是莒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大事之一。在“入向”之前，莒迁都怕是有些时日了。到了隐公二年的时候才爆发，这表明，莒国已经完成了从迁都到扩张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迁都之后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到隐公八年九月与鲁隐公会盟于浮来山，正是莒国大兴土木，进行建城堡、搞扩张的一个重要时期。莒国为什么要大肆进行城墙的建设，这也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在周边大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在这块冲积平原上，莒国建构自己的城堡，不甘心当一只被大国任意宰割的羔羊！

隐公八年的这次会盟，从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莒国在其他子国中的地位，也使莒国赢得了发展的机会。直到周桓王二十年六月，鲁桓公与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在今天的宁阳县境内），莒国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展开了外交，一方面加紧备战，赢得了时间，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城墙，而使诸侯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四

鲁隐公八年（前715），是莒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一个文明礼仪的国家的君主鲁隐公来了。我们可以不去研究他是如何来的，但他毕竟来了，他来与莒国这个小国的国君会盟来了。至于这次会盟为了什么，苍茫的历史很有点儿残酷，它消磨了无数个细节，让历史学家们绞尽脑汁。于是当代一些考古、考据家们便不断地进行挖掘和搜集，寻找历史的谜团。他们认为：莒鲁两国有疆土之争，但正是由于莒国城墙的坚固，鲁国对于这个不起眼的子国也莫可奈何。经过多年的争斗，鲁隐公只好屈尊来到莒国的城下讲和，以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故事的另一层含义，也就是间接地说明了莒国城墙的历史。但因为鲁隐公与莒子会盟于浮来山，在以后莒人的眼中浮来山的银杏树就陡然增加了它的历史的厚重感，使莒国的后人把浮来山银杏树的历史向前大大的推移了。

如今，在浮来山定林寺的银杏树下，有一块碑，碑文是清代莒州太守陈全国所写。其中还有陈全国题的一首诗：“大树盘龙会鲁侯，烟如锅盖任浮丘。形分瓣瓣莲花座，质比层层螺髻头。史载皇王已廿代，人间仙释几多流。看来今古皆成幻，独自长生伴客游。”每每我陪外地的朋友来浮来山，每一个解说员都用同一个版本向游客叙说着浮来山的历史。陈太守的这首诗成了证明银杏树树龄的一种考据。解说员们说在鲁隐公八年的时候，银杏树已经是参天大树了，那起码得有几百年的历史，由此推来，银杏树至少也得有4000年的历史。说明银杏树树龄的间接考据，还有定林寺南、“文心亭”旁的大石上有一个镌刻的篆书“象山树”三字，底下有一署名：慧地书。据历史学家郭沫若考证，此题字应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刘勰当年出家是在浮来山定林寺，法名慧地，这当属他的遗迹。这是后人的附会，还是真的是刘勰所书，同样是一个很难证明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浮来山的银杏树之大，树龄之长。

研究莒鲁会盟，我们不能绕过鲁隐公这个人物。事实上，鲁隐公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之所以出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左传》记事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他的父亲鲁惠公在其夫人孟子死后，续娶随孟子陪嫁的声子，声子生下鲁隐公。因为声子是随嫁的，随嫁的女子称“媵”，没有地位，就像后来随大户女子陪嫁的丫环。因此鲁隐公自然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到后来他的父亲鲁惠公娶了宋武公的女儿，生下了鲁桓公，鲁桓公就成了法定的继承人。鲁惠公在鲁桓公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年幼的鲁桓公无法主持国家大事，就由鲁隐公暂时在王位上，居于摄政王的位置。鲁隐公十二年，大夫羽父想担任太宰一职，就向鲁隐公请求杀掉鲁桓公，鲁隐公明确告诉他：将把权力交给桓公，自己告老退位。羽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听了鲁隐公的话后，害怕自己的行径被披露，便恶人先告状，到鲁桓公那里说了不少隐公的坏话，并请求杀掉隐公。经鲁桓公同意，羽父就派人刺杀了隐公，从此鲁桓公成为鲁国国君。

在鲁隐公执政期间，正是莒国开始扩张的时期。这里有一些大事可以看出它扩张情况：鲁隐公二年，莒人入向；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在这一时期，莒国通过蚕食等手段不断向外扩张，向周边小国发起攻击。鲁隐公八年的秋天，他以大国国王之尊，来到莒国城边的浮来山上，与莒国会盟。《左传》记载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之好也”。“成纪之好”是会盟的目的。纪国是一个小国，与莒国相邻，但势力与莒国相比要弱得多。莒国常常与之发生冲突。纪国为了寻求依靠，就与鲁国联姻。在莒鲁会盟的前六年，也就是鲁隐公二年九月，纪国国君派大夫子帛到鲁国迎娶鲁隐公的女儿做纪国的夫人。正是因了这层关系，鲁隐公才来到了莒国的浮来山，与莒国的国君会盟，调解莒纪两国的关系。

这些考古家们在证明银杏树辉煌历史时，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自然所生产的河流、高山、树木，虽然与人类的劳动结合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虽然也可以包容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并形成独有的文化现象，甚至会成为人类祖先崇拜的象征，但它毕竟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不会是、也决不是人类文化自身生产的产物。银杏树虽然可以说明浮来山当年的辉煌，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解说，作为历史见证，但它与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莒国古城墙是莒先民在历史的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它是真正的莒文化的象征。

五

城墙的消逝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人们当时拆除这古城墙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即使在几十年之后，我们也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年人们对于历史，对于历史古迹的心态。城墙是高于文字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莒城墙被时光撕成了文明的碎片。我存有莒县政协编写的《莒县文史资料》，封面上，是一座古城门，巍峨雄伟，颇为壮观。这是否就是莒国故城的城门？如果是，那现在却只是一个虚无的存在，那城门，早已化做历史的烟云，飞入蓝天，飞入大海，散入莒国大地上，与莒国的土地溶为一体，化作了不可触摸的历史虚无。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此处，回顾发生的一切，我们便会感到阵阵的揪心与疼痛。历史不可以假设，人也不可以再次回到历史的原点。有时候我就执着地回顾着莒国城墙的历史，在我心灵的空间不断展示莒国城墙历史的辉煌。

莒国的城墙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内城，一是外城。外城又称郭城。郭城面积较大，它的南北长度为5.5公里，东西长度为4.5公里，总长度为20公里。如此算来，它的总面积大约为24.75平方公里，这一块面积我们称之为郭城。春秋时期，在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莒国在几十年之内建起这样的一座城池，会耗费莒国人民的多少血汗与财富？在这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的是官吏和普通百姓。这里可以作为这一地域的商贸流通的重要空间。我在《风采照人的莒人形象》这篇文章里，介绍了15岁的少年王孙贾振臂一呼，领导莒城人民杀了淖齿。莒城的这场暴动，应当是在郭城发生的。他们杀进了内城，从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政变。

郭城之内，则是内城。内城的长宽均不足2公里，总面积3平方公里强。内城里则是居住着国君与贵族。对莒国故城比较早也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水经注》，明确记载是“内城方12里，郭周40许里”。周代实行分封制，对分封的诸侯，根据等级要求，城郭的建制限制的相当严格。春秋时代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惯例和规定。莒国的外城与内城在建制上都大大突破了周代的规定，这一方面反映了周代中央王权的衰落，对各个分封国已经失去了制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莒国在这一时期咄咄逼人的野心。随着后来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的出现，莒城墙逐步缩减，莒有“三尊莒州”之说，元代缩一子城，明代在子城墙上用以砖砌。一直保留到20世纪。

我第一次坐在自行车上看到的如僵卧的黄龙般的莒城墙，那是郭城墙的一部分。莒国的郭城墙全部是用黄土夯筑而成。它依其自然的地形而筑，总的来看，是比较规则的。莒城墙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从历史中走来，一直走到了20世纪，留下了残垣断壁，留下的是断断续续的记忆。寻找它的原貌，已经是一个梦想。

六

鲁隐公什么时候离开了浮来山，他在浮来山上呆了几天，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这

一切并不重要了。他看到了莒国的城墙的坚固与巍峨了吗？我想只要他登上浮来山山顶，那么他一定会俯视莒国的一切。巍峨的城墙一定会给他以启示。但这一切对于莒国来说都已经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来了。这是一个小国的胜利！浮来山的银杏树下的欢迎场面一定隆重而又热烈。

此后，莒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翻新出许多值得记载的事件，距莒鲁会盟31年后，即公元前686年，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小白）避难于莒国，第二年从莒国回到齐国，开始了他的霸主生涯。庄公十年即公元前684年，谭子奔莒。以后还有庆父奔莒，正是莒国坚固的城墙，使莒国成为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著名的逃亡者之城。到鲁襄公23年即公元前550年，齐庄公伐晋袭莒，由此发生了且于门之战，从而演义出了杞梁妻哭倒城墙的故事；公元前431年被楚国所灭，再到乐毅伐莒，少年王孙贾率莒人起义杀淖齿，都与这莒城墙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七

莒国的历史给莒人以自豪，但历史同样创造着一个悖论：当你得到它给予的东西时，而你所得到的这种东西，却恰恰与你付出的相等，这付出的东西，也就是你失去的东西。这里边包括你的青春，你的活力，你的不拘一格的创造，和那应该更属于你自己个性而环境却不容许你发挥的东西。而你得到了的那些东西，却又极可能限制了你内在个性的张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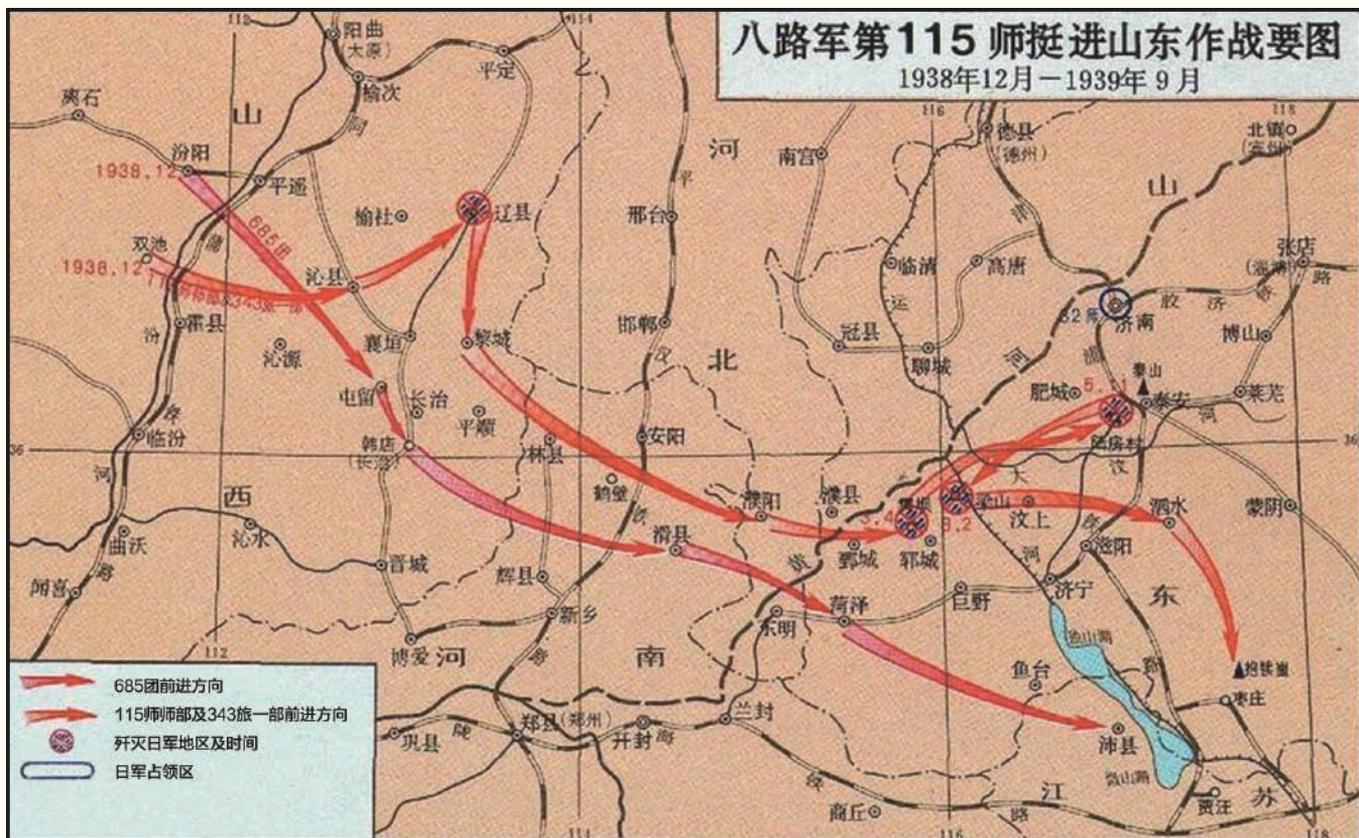
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表现出它的轻灵，一方面又表现出它的沉重。莒城墙在保留了近2700多年之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莒人以十分决绝的态度使其消逝了，我不知道这是历史之重，还是历史之轻？

多少次，我还在回想起我坐在教室里复习准备高考的那个年月，回想着城墙被拆除的岁月，回想着我对于历史本身的思考，对于城墙的思考。那也许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同时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城墙既然消逝了，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而悲伤，在这大自然的空间，在我们思维的空间，在太阳底下，一切都是新的。

一一五师挺进沂蒙

本 编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汇报工作时，曾要求党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去作为骨干，担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7月到9月，小部分八路军进入冀鲁边区。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军委派八路军分散布置于华北敌后。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个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12月，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进入湖西。1939年3月1日，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入鲁西。后挺进鲁南。





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前，师部分领导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晋西区党委部分领导在山西孝义县碾头村合影。中排左起：林枫（区党委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罗荣桓；后排左起：张稼夫（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光、王达成（区党委组织部部长）



1939年8月2日上午，日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庄附近。该敌孤军深入，距郓城、汶上、东平、寿张等据点均有50余里，难以策应求援。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决定歼灭该部日伪军。一一五师特务营从侧背袭击，歼其一部。晚上，独立旅第一团三营的两个连占领独山村制高点，与敌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歼敌300人，残敌向汶上逃窜。图为梁山战斗参战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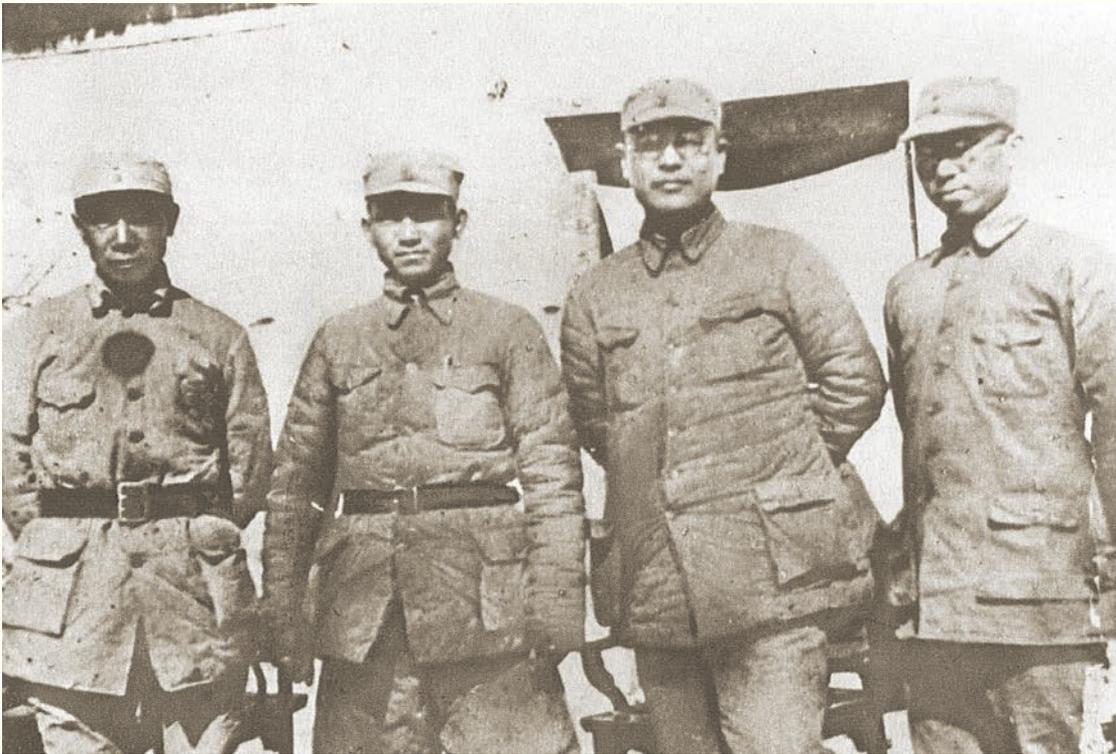
苏鲁豫支队骑兵营之一部



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率领下渡河行军



1939年秋，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左三），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罗荣桓（左二）、在山东与泰西地委青年部长袁振（左五）等在泰西肥城合影



1940年，罗荣桓（右一）、陈光（左二）、陈士榘（左一）到达鲁南与鲁南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孔昭同部的高级参议、鲁南参议会参议长彭畏三（右二）合影

何九峰择费县终老

平凡

谢公行处苍苔没，李白好入名山游。

郑和扬帆鲸波间，霞客著作美名留。

这四句开场诗，列举了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四位旅行家。谢灵运厌倦仕途，托病回乡，隐逸泉林，纵情山水，寻找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解脱。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一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也是在旅途中吟颂出来的。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劈波斩浪，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徐霞客出于对祖国山河的强烈热爱，放弃仕途，寄情山水，游遍全国名山大川、海隅边陲，撰写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

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自古以来，中国人似乎与山水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或寄情山水，或忧国忧民，或隐居田园，或放浪形骸，或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或神游沧海漂舟楫于天地之间，思想没有束缚，形体不拘世俗，是真正能够体会幸福的人。此谓之死生之美。为追求美的极致而幻化达到庄周与蝶的境界，这就是文人情怀。史上痴迷山水之事例，不胜枚举。

话说西汉末年，有一位隐士，名叫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他性情淡泊，崇尚中和，博学多才，尤其精通《老子》和《易经》。怎奈家中一贫如洗，没有资财和粮食，难以维持生计。有人赠送给他食物，他坦然接受，但是只收取三日所需，剩余的如数退还。王莽当权时，大司空王邑连续几年推举他做官，都被他坚决推辞。他平日隐居家中，潜心学问，很少与外人交往。读《易经》至《损卦》《益卦》，喟然叹息：“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

到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向长的儿子娶了妻，女儿也出了嫁。大事办完之后，他告诉家人：从今之后，家中琐事，一概与我无关，就当我已经死了。于是脱离尘世烦恼，纵情任意，不受拘束。有个成语“向平愿了”，说的就是他的故事。后来，向长与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北海禽庆，一起结伴出行，游览五

岳名山，再也没有回过家，最后不知所终。这正是：

明山秀水是归处，心无挂碍自逍遥。

如今再说一个因痴迷山水而抛家舍业的奇人，姓何，名向，字符卿，明朝末年浙江龙游县人。龙游县原名太末县，因境内有座龙丘山，唐代改名龙丘县。五代吴越时期，吴越王钱镠觉得“丘”与“墓”意思相近，不吉利，于是根据境内丘陵起伏如游龙，改龙丘县为龙游县。

龙游城北20多华里，有个西何村，村内以何姓人居多，何向就出生在这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里。何向是个读书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古今奇闻秘史，无不通晓。他虽然是县学的秀才，却无意科举，不求仕进，读书之余，最喜欢游山玩水。

位于县境东部的龙丘山，因汉代高士龙丘苕曾经隐居于此而得名。龙丘苕学识渊博，不求显达，隐居山中，安然自得。南朝宋元嘉年间，徐伯珍在龙丘山建了一所“安正学堂”，授徒千人，成为浙中最早的儒教中心。唐代徐安贞，自幼读书龙丘山中，神龙二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后来弃官隐居此山。何九峰追慕先贤德行，喜欢龙丘山清幽寂静，经常前去游玩逗留，品风赏月，竟日淹留。龙丘山又称九峰山，他于是自取雅号“九峰”。

何九峰有个儿子，乳名五启。等到儿子长到18岁娶妻成家之后，他就效仿汉代向子平的做法，把儿子留在家中，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岭南的罗浮山，江西的庐山，都留下他的足迹。清朝顺治十五年，他一路向北行进，登泰山，渡黄河，到达燕赵大地，拜访京城，凭吊易水。又东去海边，登人间仙境蓬莱阁，领略海市蜃楼奇观。又辗转前往圣城曲阜，追思周公、孔子之遗风，依依不忍离去。

何九峰阅尽名山大川景色，心中最割舍不下的，却是鲁南一带的龟、蒙、凫、峰几座山峰，也就是《诗经·鲁颂·閟宫》说的“奄有龟蒙”“保有凫绎”。凫山、峰山，都在孟夫子的老家邹县，何九峰徜徉其中，写了很多诗篇，后来收录在他的诗文集《蒙南集》里。

“龟”指龟蒙山，“蒙”指东蒙山。龟、蒙二山，实乃同一山脉的两座高峰，都在费县境内。何九峰非常喜欢蒙山景色，常年置身其中，踏破铁鞋，流连忘返，写了很多优美的诗篇。

蒙山有座山峰，老百姓称作“挂仙槲”“挂心岬子”。何九峰对这些俗气的山名大为不满，另给它取名“文笔峰”，并撰文说：“文笔耸拔，秀出天表。俗呼‘挂仙槲’，谬甚，俚甚！其标格，宛然海上员峤，正与‘琅邪’对。琅邪，今沂州，晋汉多名贤，前有武侯，继有休徵，二王墨妙，冠绝今古，颜氏书法，得之家学，非兹山之毓秀欤？”

他认为，正是这座文笔峰，孕育出了诸葛亮、王祥、王羲之、颜真卿等沂州优秀人物。他为此作了一首《文笔峰》诗：

崑崙凌空耸一峰，宛然天半翠芙蓉。

望通员峤奇争出，地接琅邪秀独钟。

诸葛将韬筹虎豹，右军书法舞蛟龙。

平原妙腕翻新意，纸背犹能透几重。

蒙山深处有一尊巨石，悬空挺立，形似一位神态自若的老翁，当地人称之为“老儿石”。何九峰在这尊象形石的身上，依稀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作了一首《老儿石》诗：

者个老儿非等闲，斑衣鹤发驻童颜。

任他世上风波起，只在中山不出山。

蒙山南麓、沭河岸边，有个石沟村，村内修建了一座道观“龙仙观”。顺治十八



蒙山文笔峰

年，应道士阎德宏之约，何九峰撰写了一篇《龙仙观记》：

蒙山为齐鲁之镇山，其间丹崖青嶂，碧涧寒松，要亦神仙之会。故行歌采药者，往往得遇异人，若羡门子高、周义山，恒见世上。嗣后，贾成公复冲举于宋，今之玉虚万寿宫即其地也。而玉虚之派类多祖师，惟石沟龙仙观最著。山环水带，泉石清幽，而古檀桧柏，老屋数椽，世莫可考。每搜剔于残碑断碣，其岁月仅留行间者。自唐迄宋，由金抵元，几播迁修葺，水火频仍，而不绝香灯如一发。迨世际大明，圣王御宇，内佐贤相，外列能吏，一路无尘，百废咸举。

斯观之聿新，在万历十年，知县杨果所募也。当神庙之季，盛极衰来，蝗蝻作祟，盗贼旋踵，村落化为荆棘。彼仙宗佛祖，求盖茅戴笠不可得。今年，余心期胜事，与二贤结交，南攀王子，有无功之遗风，西接孙君，得子荆之遗韵。予亦学仲常子光，曳杖河渚间，但不能痴聋瘖哑，见人若寒鸦晨雀，喧噪不已。故二贤心虽肯而口多未许也。两君应岁试，相寻于仙源道上，予则蹒跚凉凉，吟咏泽畔，更遭沙明水净，月白天空，提携二三童子，或鼓鸾笙，或吹斑管，宫商惨淡，鸥凫卒惊。予且衔杯长啸，使头上银河直欲倒注，此其乐，诚莫可喻。独憾两君者，方伊吾蚊蚋间，未能分我半席也。

羽士阎德洪曰：“斯不可无记。”并乞一言，以详观之始末。予曰：“此玉虚下院，混元老君所居也，故西拱道陵，东侍尹喜，惟老君恒与二仙人游息。仲尼曰：‘老子其犹龙乎？’则‘龙仙’之名必本此。”强笨伯为解人，抑难矣。德洪事母孝，故菽水承欢不衰；事师忠，几建碑营墓，其劳益著。虽身在云水，其志行可观又如此。语曰：“天下无不识字神仙。”又曰：“神仙必本忠孝。”今德洪即身未受灵书紫文，濡足水火，而一念出家，孜孜向道。使他日世缘将断，必朱幡白羽，迎羡门于清泉白石间，则蒙山又传一故事，不然彼玉虚之脉，由子而微，贾仙翁者犹笑人寂寂矣。德洪闻予言，当焚修益力。

德洪一字纯如，以近里巷语，命以讳行，而更名元量。孙君名鉴，字亮士；王君名简，字文子，曩时种桧于甬道者，即尊甫敬基先生也。例得并书。顺治辛丑后七月二十日丁酉。

费县城北八里，有座佛寺叫“寒两寺”，始建于唐代。此处树高林密，十分幽静，俨然世外桃源。尤其酷暑时节，山外烈日蒸烤，山里凉爽宜人，因此又称“寒凉寺”。清代《费邑古迹考》说：“寒两寺，在县治北，钟山后。前明为文人会处，多



“芳林苑”遗址

题咏。”何九峰也很喜欢这个幽静所在，作了一首《寒两寺》诗：

蹬转峰危重跻攀，疏钟古木乱云删。
此时野客春行路，当日高人昼掩关。
孤鹤几临秋涧水，晚霞初挂夕阳山。
诸君为爱溪藤月，石冷烟横未忍还。

何九峰寓居费县，流连徘徊，不忍离去。他与费县著名的文人雅士成为知己好友，包括前明进士王政敏，岁贡生王简，廪膳生朱衣等，都是谦谦君子。他们效仿唐代“竹溪六逸”，结为“六老会”，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其乐融融。何九峰所结交的，都是志向高洁、不慕荣利的贤者；如果不是这种人，即使再有权势，他也不屑一顾。

朱衣在费县城西有一处私家园林“芳林苑”，是“六老”雅集之所。园内有一座人工叠石而成的假山，叫块阜山，模山范水，阅音修篁，朱衣很是喜欢，自号“块阜山人”。王政敏也很喜欢，专门写了一首《块阜山咏》诗。何九峰也很喜欢，长期居住在园子里，俨然是芳林苑的主人。

何九峰是南方人，有喝茶的习惯，喜欢每天坐在竹林里读书品茗，联句赋诗。他嗜茶如命，缺一不可，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应俱全的茶具，包括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盘、茶鼎、茶瓿、茶臼等全套用具，装在一个叫作“茶籛”的箱笼里；还有烘茶叶的竹制器具“茶焙”，煮茶的小火炉“茶灶”。他还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写了一篇《茗醉先生传》以自况，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费县城内有座“火神庙”，始建于明代，清顺治十七年重修之后，何九峰应邀撰写了一篇《修葺火神庙碑记》：

火为五行之一。其德配水，其用溥。故神为尊，或祀五帝，或兆文明。或五浊秽乱，六欲纷更，则流而为劫，益燔以□□，□使昆虫草木皆无所避，则造化之妙于用也。《传》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则寻常日用，至不可以须臾离。又不得□□□神为祟，置而不问焉。则祝融、回禄之祀之也固宜。

费邑西关之有火神庙，其来久矣。自先朝太平时，民安物阜，□多显应，民获福祉。凡春秋享祀，介在祀典。即月之朔望，善人信女及邑之父老，咸携浆挈燃烛蒸香，竭诚致敬，济济雍雍，趋踰庭下。里巷之谈故事者，必曰当时神灵若彼，民心若此。三十年来流离，满目蒿莱，□□□所届，岂神之不爱其民，而令其凋残若是欤？

□神有大不忍于中者，阴阳异途，故不能向土木问也。

今天子圣明，群工有道，民社将熙，□有起色。则吾神显灵示应之秋，□祠宇修葺，胡不讲欤？今里中□高，万民□□□□敬，醮金会义，积聚维时，敬卜期月，垣以周遭，新其榱桷，廊庑之□。又建经堂，延僧道，遂早晚钟磬，讽诵功□，□□□祈祥解青，以禳里巷之福。于祀典庶不少废，亦事之不可缓者也。

今幸告成，凡徼惠吾神者，盖不浅矣。敢用荒言，以识之石。非夸吾党之功，以明神道昭格若此，使千百年后，或□□□□庙貌倾圮，有志君子，循兹绳墨，再理法宫，则神之利泽，盖永远不忘也。

时顺治十七年庚子。

从“吾神”“吾党”等语可以看出，何九峰已经自觉地融入了费县，成为费县的一员。费县人请何九峰为自己顶礼膜拜的火神老爷撰写碑文，也是真没把他当成外人。

何九峰寓居费县20年，讴歌费县20年，最后因病去世于费县城东小花山的友人李氏家中。何九峰的尸骨，还有他心爱的茶具，一同埋葬在小花山的南麓，山下是流水潺湲的沭河，蜿蜒如玉带。费县人王简为他撰写了墓碑，滕鹿嶗篆额，关中雷亨坤书丹。

人们常说：“择一地而终老。”人终将老去，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缘分。何九峰喜欢费县山水秀美，更喜欢费县人情古朴。他选择文化底蕴深厚的费县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最后长眠在费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这是何九峰的福缘，也是费县的荣光。《光绪费县志》的《人物》一章《流寓》一节，有给何九峰写的传记。

何九峰不是费县人，却做了很多费县人做不到的事情；何九峰是南方人，却比费县人更热爱费县。

后人诗赞曰：

辞别越国居鲁邦，蒙山沭水岁月长。

茗醉不知身是客，此心安处是吾乡。

关于夏氏起源于山东考

温玉春

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观点。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誉、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



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坨城故址。（《太平寰宇记》说徐州彭城县下亦有“坨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輿地志》云：‘坨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坨，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四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三十三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

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四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滕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人。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

《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开春》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二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三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



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輿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十八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

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弥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当在今新泰市一带。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姁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姁”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在今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地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虜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识》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啻以上，世掌射正。至啻，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但据《水经·沫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粗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沫。河口有粗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粗，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粗城。穷石即穷山、穷桑，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粗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

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缙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澆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第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区、淄博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邱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季夏》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囂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

（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又曾田于东阳、萑山。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萑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萑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萑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瓚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郟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郟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缙氏叛之，遂克有缙，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缙氏即岷山氏，又作蒙山氏，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

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嶷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现认为，当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丑”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丑”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郟国，在今临沂市城北15里郟古城村，妘姓，禹后。鄆，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兰陵县西向城镇。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以上，笔者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繁琐论证和大胆推测，虽然有些论证还不够严密，但推定夏氏族起于东方应该说是具有相当根据的了；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



沂水“刘南宅”官宦之家的起步者——刘励

刘海洲

据史料记载，沂南县城老城区西南部曾有处“刘南宅”，是沂水明清两代缙绅刘氏家族的庄园住宅。“刘南宅”在明清两朝数百年中，一直是沂水县最大的缙绅士族，家族中出了六位进士，六位举人，为官者不计其数。

“刘南宅”是怎么发迹的呢？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始祖刘志仁很穷，给城南南庄村地主家放羊。有一天放羊时偷听到两个看风水的人指着一块地说：“以后谁家把这个地方当作阴宅，谁家就能发达了。”他听后牢记着这句话，后来地主家要赏给他一点土地让他结婚独立生活时，他就向地主要了那块地。他死后叫家人埋在了那里，后来刘家就真的发达了。这个故事说明了风水的重要性，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事实并非如此。

刘家发迹靠的不是风水，而是勤劳致富、善于经营的结果。

“刘南宅”的祖先刘堂在明初由四川省内江县迁居山东潍县南司马村，后来刘堂从潍县又迁到当时的莒县北部冢头村（今属安丘），安居不久，刘堂留下后妻及后妻的两个儿子，自己带着长子志仁（前妻所生）夫妇再迁沂水县南关。刘堂和长子志仁来沂水后，以织布、卖布为业，常年往返于沂水城与南乡



沂水县城“刘南宅”旧址

苏村之间，因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志仁的三个儿子中，次子刘励就是通过科举进入了仕途，此后家族越来越兴旺，科第蝉联，代有闻人，一直到清末。现在刘南宅后人除了分布在沂水及周边地区外，还有不少族人在东北。留在莒县冢头村的二支和三支称作莒县刘氏，沂水刘南宅长支称作沂水刘氏，两地合称“莒沂刘氏”。

莒沂刘氏以刘堂为始祖一世公，刘励是第三世，他是刘南宅走向官场的第一人。

《刘氏族谱》中有一篇《潍县世祖谱考》，此文说：“按英配石氏，生堂，堂配解氏，生志仁，继徐氏，生悦、生明，志仁迁居沂水县，以孙贵赠通议大夫、太常寺少卿，志仁生励，岁贡生，万历戊子副榜，任邱县教谕，升知县，未任，以子贵赠通议大夫、太常司少卿，励生应宾……”

清道光七年《沂水县志》对刘励有多处介绍，其中在“封典”部分载：“刘励：任教谕，以子应宾初封文林郎，直隶南官县知县，妻王氏封孺人。加封承德郎、礼部仪制司主事，王氏加封太宜人。又加封奉直大夫、礼（县志作“礼”是错误的，应为“吏”。考察官员功过的“稽勋司”属于吏部）部稽勋司郎中，王氏加封太宜人。天启四年。”《刘氏族谱》《沂水县志》和《刘励墓志铭》三者对比起来看，没有任何出入，俱为真实。

这篇墓志铭文字很长，作者是应刘励之长子刘应宾的请求撰写的，所以写的很卖力气。我们顺着志铭文字看一看其主要内容。

盖上额题点出了墓主人的官职和封爵。刘励只做过一次官，就是丘县的教谕（八品），官阶不算高，但托了他儿子刘应宾的福，被朝廷三次加封，最后一次是吏部稽勋司郎中，于是就用这个“诰封”冠名。在叙述墓主人的生平事迹上，写得具体感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刘励年少时读书刻苦用功，学习优秀，然而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最终仅是贡生身份。在弟兄们分家时他把家产多数让给兄弟们，家虽分了但看他和弟兄们的感情还和没有分家一样。在家乡他仗义执言，帮助民众，陈请县官减轻徭役；饥馑之年他积极赈灾，被民众赞为“活菩萨”。他被推荐为丘县教谕上任时，民众扳车不让他走。在任丘县教谕期间，他儿子应宾调任附近的南官县当县令，把他接到县衙团聚时，他一再告诫儿子要廉洁执政，洁身自好。他为了避嫌，不但在南官住了几天就回去了，不久连自己在丘县的教谕一职也辞掉了。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诱利，无怵祸，精白一心，可以报主，可以全身。”仅仅这几句话，就可看出刘励思想的高境界。

刘励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卒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在墓志下半部分，详细介绍了刘励的子女辈和孙辈的名字及配偶籍贯出身，看出他们的姻亲多是官宦之家。像所有墓志铭一样，撰者在最后用七言韵语，高度概括和赞美了刘励的一生，铭文共十句。

志铭撰者朱延禧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地位极高，头衔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查，单说他的“柱国”一衔就是从一品，一个堂堂知县才是正七品，朱延禧的官职之高可见一斑。

姜太公故里浅探

赵子义

姜尚是建立西周王朝第一位功臣，又是开齐国的始祖。他的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史考，姜尚即历史人物吕尚。《鬻子》《六韬》《金匱》《搜神记》等书中，已渐对其加以神化，至《封神演义》而达于极。姜尚是什么地方人呢？本文就姜尚故里进行一点浅探。

一、姜尚诸多名字的由来

姜尚，名牙，或字子牙，号飞熊，又称太公望。他的称谓很多，但每一个称谓都有一段传奇。



究其源，姜尚是炎帝的后裔，伯夷之后，“东海上人”。《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乃“东夷之士也”。先祖被史称为东夷人。《纲鉴易知录》云：“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宛县西一带）”。故，姜尚又有了：吕尚、吕望、吕牙等称谓。

“太公望”的名字又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通‘干’）求周西伯（文王）。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北岸），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即是说，周文王姬昌的曾祖父公叔祖类，渴望有圣贤之士辅佐周室成就霸业。当姬昌与姜子牙相遇，问定鼎天下大计时，姬昌不无感慨地说“吾先君太公望你好久了。”于是姜尚又被称作“太公望”。

日照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文王访到姜尚时，尚让姬昌背着走，到走不动为止；让其儿子拉太公望坐的车，到不乐意拉为止。文王背着尚走了四十八步，儿子们拉着太公车走了八百零八步。尚当时向文王父子宣称：“你周朝只能出四十八个皇帝，有八百零八年的江山”。此事虽纯属民间传说，但也反映了姜太公的神奇及其丰功伟绩。

太公望辅佐周武王（姬发）时，被尊称为“师尚父。”他挥军与诸侯会师于盟津，率兵和四方部族伐纣，战于牧野，平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此皆因“太公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周王朝在分封宗室贵族和异姓功臣时，首先把太公望分封到齐地去就国（侯爵）。这或许是周王朝对姜尚的特别信任和倚重，亦或是用尚之智勇来继续扩展疆土，以达到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目的。姜尚就国后，推行一套易于融合各部落关系以开发齐地的施政方略，即：“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对齐以外的五侯九伯只要不听号令者，则征伐之。于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致使齐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日渐发达，后成为东方大国；能号令天下诸侯，而称霸中原。自此，史称姜尚为“齐太公”。而日照民间，惯称其为“姜太公”“姜子牙”。

二、姜尚故里之说

（一）姜尚是东夷人之说

《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东夷之士也”。从考古角度来看：“聚居在今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祥地”。（《历史研究》1987第3期）《后汉书·东夷传》又云：“东夷率皆土著。”也就是说，聚居在山东乃至周围地区沿海土著居民，就是东夷族人。

《吕氏春秋》亦载称姜太公是“东夷之士”。

从传说时代来看，姜尚是炎帝的后裔。《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即岐水）成，成而德异，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后炎帝被黄帝战败，其部族与黄帝融合（华夏炎黄子孙由此沿说），一部分发展到今山东沿海一带成为东夷族。至尧、舜、禹时，姜氏族已成为统领“四岳”之首领。“四岳”，是官名，是四方部落或方国的大首领。在《尚书·尧典》里说“四岳”不但参政天下大事、执掌部落的军政大权，还有推荐舜为尧的继承人等重要



东夷部落

事项。可见姜尚的先祖权力之大。在虞夏之际，姜尚的先祖辅佐大禹治水、攻伐三苗、会诸侯于涂山等立下了头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宛县西）。由此可见，姜尚的家族是东夷的大氏族。

（二）姜尚是东海上人之说

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太公望吕尚者（即姜尚），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孟子·尽心》篇里说：“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在这里也肯定了姜太公濒东海而居。《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说：“桀为暴虐，诸夷内叛，殷汤革命……”由此可见，像姜尚这样一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此时审时度势，隐居东海（边）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韬晦之计。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盛冬铃·《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一文里论述姜尚是东海上人是这样说的：“可能吕氏子孙繁衍流散，其中某个支系后来迁徙到东海之滨与夷人杂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势力的一个集团。而太公望正是这个姜姓吕氏集团的头面人物，具有大族长的身分。所以《孟子》等书提到豪杰归国，都把他与诸侯之子伯夷同时并举。”由此可见，姜不但故里就在“东海上”，而且是和夷人杂居的大集团的领袖人物。这亦符合姜尚出将入相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姜尚是山东人之说

以上谈了姜尚是“东夷人”“东海上人”。那么，何以见得是山东人呢？《说文》里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夏商周以来所说的东方正是指山东。史学界承认山东人即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夷字，象征着一个大个子的人。可以说，齐国人对东夷人发明了弓箭是很崇尚的。东夷族人居齐鲁之邦，甚至范围还要大一些。像孟子、司马迁所说的姜尚是“东海上人”，其本意就是指山东以东。建国以来，史学界通过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对此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东夷族人就是山东土著民族。逢振镛在《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中说：聚居在今天的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源地（《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吕氏春秋·首时》肯定了姜尚是“东

夷之士”，即是说姜尚是山东人，应当无可非议。

（四）姜尚是日照市人之说

《谷梁传》云：“莒虽夷狄，犹中国也。”这里所指的“中国”，是以夏商周先秦以来的帝都为衡量标准。琅邪郡海曲县，即今日日照东港区一带，是在帝都正中间的最东边，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明、清乃至以前的各代方志学家，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考证、分析、推论，才敢在志书上这样定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查方志皆云：太公望所出东吕乡。东吕乡是西汉琅邪郡海曲县所辖的乡。海曲县在公元17年被吕母起义军所破，此后，又先后隶属于昆山县、西海县、莒县、梁乡县。宋哲宗元祐二年，莒县始置日照镇。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日照县。1985年日照撤县划市；1989年，又升格为地级市。古代的“东吕乡”即今日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地域。为进一步研究、考证姜太公之故里，现将有关志书所载资料摘录如下：

《后汉书·郡国志》云：“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

《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元和郡县志》云：“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

《续汉郡国志》中西海县条云：“太公望钓于棘津，其浦今存。”《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353页载：“西海县……古城在今山东日照县西。”

光绪版《日照县志·古迹》云：“棘津：城东二十里，去海里许，一名姜公台。”

三、日照东吕乡浅探

史书和志乘所云“东吕乡，太公望所出”，何以见得东吕乡就是太公望所出呢？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乡党制”和东吕乡的基本脉络。

乡党制的建制始自西周。《周礼·地官》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矜；五州为乡，使之相宾。”由此而知，周制是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司马迁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但司马迁生于汉时，汉时的乡领一千五百至两千户。由此来看，当时的“东吕乡”所辖人口（家）数，与现在乡的大小数相差不大。由此推论，“太公望所出”的“东吕乡”即今东港区“东港（边）上”的秦楼、石臼一带地域。

为了进一步证实姜尚所出确是东吕乡，笔者又对各种版本的《日照县志》及《莒州志》《沂州府志》《胶州志》等方志进行了比较；对清代日照名士丁恺曾所著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史籍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地域清楚，记叙趋一致——日照古时的东吕乡，太公望所出，有棘津、姜公台，明万历年（公元1537—1619年）间，尝有古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即当年姜太公垂钓的姜公台，台上曾置姜公祠。

清代学者丁恺曾有诗描绘姜公祠：“……征之班马符节似，即今钓鱼犹有台。曾读邑乘见遗诗，鹰扬有像双白眉。此祠尚留神宗末，何年瓦甍坦墉圯。”因年代久远，蹋圯失修，姜公祠只保持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两城镇遗址现场发掘

四、日照的龙山文化与姜尚的关系

近年来，人们对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掘和研究都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给予山东的龙山文化很高的评价，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具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典型性，是光辉灿烂的东夷史前文化，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日照市的龙山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那么与姜尚及其故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来略抒这方面管见。

日照市自上世纪30年代始首先在两城镇发掘了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后又在东港峪和尧王城发掘了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继而又在固河崖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正好是日照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基本确立了父权制。日照的龙山文化正好过渡到古文明的开始。

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1800年，而日照的两城、东海峪等龙山文化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2400—2000年。这一时期正是形成夏文化的时期，也是东夷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有的专家查阅了夏以来的外交史，发现几乎全部与东夷族和四方部族有关，可见东夷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有的学者推算过，这个时期在中原是尧、舜、禹的时代，在东夷则是少昊、有虞氏的时期。姜尚的先祖掌四岳。从日照的龙山文化年代上看，其时代基本上与两大派系活动的中后期相吻合。即是说，从日照的东海峪、两城龙山文化形成年代来看，正好是姜尚的先祖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鼎盛的时期。

从制陶业来看，东海峪和两城出土的陶器从制作术到造形工艺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两个遗址中都以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较大比例，陶色纯正，质地细腻，油光放亮。薄胎高柄杯，胎薄如蛋壳，质坚如石，20多厘米高而重不过50克，并外刻纤细精致的花纹和镂孔，被誉为高柄蛋壳陶，堪称我国史前社会陶艺珍品。两城、东港峪的制陶业，代表了东夷族的陶业艺术。《韩非子·难一》有这样的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周礼·考工记》亦云：“有虞氏尚陶。”《世本·作篇》云：“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也。”有虞氏尚陶是整个东夷族在尧舜禹时代尚陶的缩影。二三十年前，杨向奎先生就指出有虞氏乃至整个东夷族尚陶。时至

今日，已经在两城、东港峪龙山文化遗址得到印证。那么，姜尚的故里不是由此也得到了印证吗？

传说时代的少皞（少昊），名鸛，一号金天氏，东夷族首领，以鸟为图腾。《淮南子·本经》载：“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这或许是有九个崇向太阳的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被羿打败了。而东海峪中层出土的龙山文化就有“鸛鸟形足鼎”，两城遗址里亦有像等腰三角形足或鸟头足鼎。这说明，生活在日照沿海的姜尚先祖们很可能是鸟图腾部落，最起码也与少昊鸛和鸟图腾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城出土的石器，大都磨制非常精致，刃口锋利，用的是管制钻孔法制孔。出土的玉器很精致，有扁平钻孔斧，扁形长方形斨，上面还有不同图案的面文。这充分反映了先人们高超的琢玉技术。这说明，日照的龙山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四千年前的日照早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聚居在日照沿海一带的姜太公先祖们，是创建日照古文明的始祖。

在东海峪遗址里，还发掘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的夯筑技术。这一建筑技术开了我国建筑史上的先河。张学海先生认为：“在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至商文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如河南龙山文化的夯筑城堡，二里头文化的夯筑宫殿基，都是东方技术向西传播结出的硕果。”前已探讨过，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迁徙到河南，而从河南夏文化的发掘来看，也正好与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把夯筑技术传播到河南相吻合。居住日照的姜太公先祖，是夯筑技术的最早发明者。

在东海峪以西八公里处的崮河崖又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来看，是继两城、东海峪以后的文化，形成年代在公元前19至16世纪期间。从出土的几件“伯鬲”来看，可能形成的时代还要下延。此“伯鬲”可能是商朝中后期莱侯之物。其它文物从形成的年代看正好是夏朝至商朝的中期。这期间正是各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帝武乙（康丁之子）。《后汉书·东夷传》载：武丁（盘庚的弟弟小乙之子，商王）时“东夷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说明商朝后期东夷族对华夏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到了帝乙即位时（帝乙之子帝即是商纣王），还屡屡攻伐东夷。这期间正是姜尚在日照成长到成熟的阶段。从以上考古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东夷族文化对姜尚的影响是相当关键的，是造就姜尚这样叱咤风云、文武全才传奇人物的不可缺少的政治时势和文化氛围。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以来的文献考证和对日照史前文化的对照分析，姜尚故里为山东省日照是毋庸置疑的。日照对姜尚的成长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其一，先祖是东夷名门望族，是创造东夷族文化的重要部落，是日照乃至山东举足轻重的大部落，大酋长；其二，在东夷先进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使他具有安邦兴国的雄才大略；其三，在殷纣王暴虐时期，有利于磨炼姜太公的意志；其五，有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方志可考，又有考古发掘的大量史前文化可佐证。可以说日照市不仅是姜尚土生土长的故里，同时又是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一名新时代军人的突击

——追记武警山东省总队特战英雄王成龙

陈劲松 潘 明



“要是当初我不把王成龙选到特战中队，就不会发生这个令人心痛的事了。”事情已经过去4个多月，武警山东省总队济南支队机动大队特战中队长夏中明仍难以释怀。王成龙是他从武警工程大学新毕业排长中挑选出来的苗子，也是他带着参加“魔鬼周”极限训练的。谁知，一场意外让任职不满一个月的王成龙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王成龙，23岁，武警山东省总队济南支队机动大队特战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2018年9月12日凌晨，在总队第三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中，面对一辆失控、严重超载的重型货车，王成龙推开战友，自己被卷到车轮下，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英雄壮举感动千万人

“接公安部门通报，一处重要目标遭暴恐分子袭击，各分队迅速按预案展开行动。”2018年9月12日凌晨4时，天空还没亮，一声短促的警报声惊醒了所有人。大家迅速从地铺上弹起来，穿戴装具迅疾出动。王成龙所带领的特战中队第一小队，很快携带装备火速赶赴集结地域。

25公里行军是本次“魔鬼周”极限训练的首个课目。作为支队值班员，王成龙走在队伍后侧指挥部队行军。就在部队行军到山东省邹城市大庄镇水河村附近时，一辆严重超载的重型货车突然从队伍的后侧行驶过来。货车连续超越4辆部队保障车辆，突然向右变道，失控冲行军部队驶去。

王成龙看到突然驶来的货车，大喊“散开”，并迅速推开身边的战士曲鸿健，自己躲闪不及，被货车卷入右前轮下……随队医疗小组立即展开急救，并马上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王成龙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胸椎多发突骨骨折、多处脏器破裂，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将23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练兵备战的训练场上。

“生死关头，是排长的舍命相救，才有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我要接过英雄的枪，继承他的遗志，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继续勇敢前行。”说到王成龙，被他救下的战士曲鸿健悲痛不已。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就在“魔鬼周”极限训练出征仪式上，这个任职不到1个月的新排长，紧握着“特战中队”队旗，昂首挺胸，洋溢着青春与朝气。

王成龙烈士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很快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大家纷纷在微博、微信朋友圈悼念这位自律、自信、自强的年轻军人，众多媒体纷纷转发他的先进事迹，相关文章阅读量达1.5亿次，视频点击量达3亿次，评论30余万条，点赞数1000余万。

自小萌生强烈的军人情结

王成龙的家乡莒南县是一方红色热土，是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齐鲁红都”“小延安”。王成龙的伯祖父是在解放四平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生在革命老区，王成龙从小接受“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洗礼，崇拜革命军人。

在9岁那年，王成龙就曾救过一个落水儿童。2004年冬天，一群小朋友在村里冰冻的池塘上玩耍。突然冰层破裂，一名小男孩掉到冰窟窿里。大家慌了手脚，王成龙迅速找来竹竿，趴在冰面上用力将他拉了上来。

王成龙对军人的崇拜，渐渐演变成对军人职业的向往。

2013年高考，王成龙考了625分，毅然选择上军校。

军校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学习、训练……王成龙样样冲在前面。战友伍思尧回忆说：“王成龙经常说，他跟我们不一样，他的肩头上还扛着一个家庭，他是父母的希望、弟弟的榜样。每天早上，当我们刚刚起床时，他已经全副武装跑了一个5公里。”

“能打仗是军人应尽的天职，打胜仗是军人追求的目标。”对于自己的训练成绩，王成龙从来没有满足过。每次训练完他都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成绩，再确定下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武警工程大学，熟悉王成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时时刻刻在心里装着打仗的人。机要指挥教研室主任潘峰说：“那真是个好苗子啊，他天天琢磨着把学到的东西用到战斗中、战场上。”

潘峰说，作为王成龙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选与密本编制相关的词频统计课题。这对于一个军事指挥专业的学生，绝对是具有挑战性的。王成龙说：“我就是想挑战自己，做点与打仗有关的课题。”果真，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毕业论文得到了答辩老师的一致好评。

始终保持昂扬的战斗姿态

“你打听特勤部队了吗？到底咋样？还是说机动部队更好一些？”

“特勤部队有一点适合你，训练强度大，出汗多，这是最能打动你的吧。”

“不！最打动我的是能够更接近战场！”

这是临毕业前，战友王皓与他的聊天记录。特战队员——这是王成龙的心中最神圣的称号，也是从军以来一直追逐的梦想。

2018年8月8日至14日，总队300多名新毕业学员在济南支队教导队进行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集训最后一天早上，特战中队中队长夏中明到基地组织考核。

“队长，把我带走吧！”王成龙向夏中明表达自己的迫切愿望。

“身体素质好，思想基础牢，能吃苦、肯吃苦、能钻研、爱学习，好久没有遇到这么优秀的排长啦。”夏中明对王成龙第一印象就特别好。

“特战中队，我终于来了！”王成龙第一天到特战中队报到时，兴奋地在朋友圈里说。那种梦想实现的情绪，丝毫不亚于他考上军校的喜悦。

尽管对特战中队挑战极限的训练强度和近乎苛刻的训练标准有心理准备，但一开始王成龙还是有些不适应，他在日记中这样自我鼓励：“喜欢努力的自己，要让自己的一生都处于积极向上之中。”

清晨6点，起床号响。王成龙已经大汗淋漓地从操场冲到宿舍楼前，努力调整呼吸，等待战士集合完毕一起早操。为了提高长跑耐力，他每天早起一小时，一个负重“五公里”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为了提高射击精度，他把水壶挂在枪口上，顶着烈日练习据枪瞄准；为了增强力量，熄灯后他在床上练习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汗水把床单都浸湿……

“王排长体能基础不错，但是由于刚毕业的缘故，技战术能力距离特战队员还有一定差距。射击、攀登、障碍、大绳等科目比较薄弱，但他很谦虚，很爱学习，一有空就喜欢向老班长请教。”作为同一个小队的副小队长，朱随军是被王成龙请教最多的一个。做中队值班员怎么组织出操，一些情况中队以前怎么处理的？训练如何组织、携带哪些装具……王成龙向朱随军详细了解中队训练的流程。

备战“魔鬼周”，中队需要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一天下午，王成龙和战友扛着圆木跑了3组800米。训练完成后，王成龙对朱随军说，我肩膀疼，帮我看看吧。朱随军掀开他的领口，看到他脖子上青一块紫一块。朱随军告诉他，这是训练时没有掌握技巧，手臂没有夹紧，圆木撞在肩膀上造成的，建议他休息一下。但王成龙说：“我没事，能坚持！”

“起灵，送王成龙烈士。”2018年12月5日上午，莒南县鲁东南革命烈士陵园哀乐低回，武警山东总队在此隆重举行王成龙烈士骨灰安葬仪式。苍天有泪，山河同悲，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总队官兵代表、临沂市党政机关代表及社会各界群众2000多人，冒着风雪严寒来到陵园，送英雄最后一程。

“成龙啊，你就这么走了……”烈士墓前，母亲管修梅最后一次抱着覆盖国旗的骨灰盒，悲痛欲绝的哭声让所有人泪崩。礼兵含泪将骨灰盒放入墓穴，仔细铺展平整国旗。鸣枪礼兵在陵园一侧列队，3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低沉的云幕，用鸣枪礼送别英雄。烈士亲属、官兵代表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墓前献上鲜花，向英雄作最后的道别。

“你我虽未谋面，但一切都那么有缘，我们是同名同姓同岁同年兵的兄弟。”仪式现场，记者见到刚从四川总队达州支队退役的战士王成龙。得知安葬仪式的消息，他特地乘飞机从四川来到临沂为英雄送行。他告诉记者：“‘王成龙’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个名字，而是一种精神力量和英雄符号。虽然自己已脱下军装，但也会接过英雄的接力棒，不辜负英雄的声名。”

中国著名歌词作家李幼荣

王 滨

李幼容，山东郯城县人，1937年生，随姐姐李中英居住在马头镇油坊街，其姐李中英和姐夫葛民监均在马头教书。李幼容年小，由姐家培养上中学，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马头省立郯城一中毕业，后参军并继续深造。李幼容青少年时代是在马头度过的，马头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他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郯城一中读书时，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他不仅文科成绩惊人，而且其他学科都很优秀，是学校的学生尖子。他最听老师话，遵守学生守则，虽离河很近，从不下河洗澡。上世纪末，我在中央乐团临沂籍独唱演员陈庆玲引荐下，有幸来到李幼容住处，他在百忙中热情接待了我，我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李幼容，解放军原总政歌舞团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音乐诗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音乐协会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儿童音乐》杂志编委。中国音协合唱联盟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1956年，李幼容在长春大学毕业后，投身西部建设，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协兰州和新疆分会会员。1977年调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文工团文



工团和总政歌舞团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李幼容作词的代表作有：《七色光之歌》（徐锡宜曲）、《金梭和银梭》（金凤浩曲）、《珠穆朗玛》（臧云飞曲）、《巴彦喀喇》（徐沛东曲）、《喀拉昆仑》（舒京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寄明曲）、《跨世纪的新一代》（刘磬曲）等。

《珠穆朗玛》1996年获中央电视台MTV大赛金奖，1997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1998年获文化部第八届文华奖，2001年又获中国首届“金钟奖”等多次大奖。李幼容先后荣获全国、全军等创作奖200多次，为全军大型文艺晚会及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大型晚会撰稿。为电影和电视剧多次创作主题歌曲和插曲的歌词。

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庆祝活动中，他组织创作出版了《明天更美好》等歌曲集及盒带，并以《明天更美好》为名的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好评。近年出版了儿童朗诵诗集及CD盘有《唱给太阳妈妈》《升起吧！新世纪的星》《五环梦圆》等三种。2002年，出版朗诵诗集《中国公民道德新歌》及歌曲《无悔的选择》，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歌曲《亲爱的党我对你说》，获第二届“金钟奖”等。

李幼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小说、剧本、散文和论文等数千篇。曾出版诗集、歌词集、朗诵诗集等十余部。如歌词集《心灵之约》，作词歌集《会唱歌的星》，2000年出版的朗诵诗集及配购CD光碟《祝福太阳妈妈》《升起吧！新世纪的星》《五环梦圆—奥运随想曲》等获得好评。出版个人诗集《天山进行曲》等四部，出版配乐朗诵集《道德之歌》《五环梦圆—奥运随想曲》《升起吧！新世纪的星》《祝福太阳妈妈》和歌碟专集《神州凯歌》等。

李幼容的作词，多涉猎军事题材，他是一个讴歌我军现代化，讴歌“两弹一星”的作者。如：第一个颂唱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歌曲《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荣获1977年全军文艺汇演大奖；第一个颂唱长征火箭的歌曲《我的心在天上》以及第一个颂唱核试验的歌曲《我把鲜花种上天》、2003年第一个讴歌我国载人航天的歌曲《神州飞歌》和2005年讴歌“神六”的歌曲《神州凯歌》等作品。涉猎少儿歌曲，以表现当代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歌曲为主，如：《七彩光之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跨世纪的新一代》《我驾飞船上蓝天》等，在开拓儿童幻想题材上作出了突破性的创新，发表演出了《幻想系列童声合唱套曲》等多部。如：《天上果园》《海底花园》《玫瑰天使》等，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李幼容曾多次参加中国青少年作家作品大赛颁奖会。他在西部题材上独树一帜，锐意创新，引起反响。首先推出了“西部雄峰三唱”，即歌曲《珠穆朗玛》《巴颜喀喇》《喀拉昆仑》，受到广泛欢迎。而后持续不断讴歌西部，如：《西部情歌》《塔里木情歌》《玫瑰与夜莺》等。因为他在西部生活23年之久，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上世纪60年代在上海知青中广为传唱的《送给你一束玫瑰花》以及《卖花帽》《卖香梨》《我们来自南泥湾》《啊，光荣的生产兵团》等等，他和王洛宾生前合作的几首《亚克西》等手稿，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推出。他还计划在新疆叶儿羌河一带采风，对这个《十二木卡姆》之乡进行了研究，以此为生活和音乐文学素材进行创作，准备推出一系列新作。

李幼容创作精力旺盛，近年来他新作不断，如由著名作曲家徐锡宜作曲的《我们是春天》《驾着太阳，驾着月亮》，曾作为中央电视台《东方儿童》栏目主题曲。肖白作曲的《总书记和我们手拉手》，孙敬东作曲的《祝福歌》、舒京作曲的《青春中国》、刘磬作曲的《我们的心儿向太阳》等等。这些作品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儿童的热烈欢迎。

我们衷心祝沂蒙老乡李幼容，老当益壮，佳作不断。

市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到市方志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1月18日，市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全体党员到市方志馆开展“学习历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参观了方志馆地情展厅。通过观看展板、沙盘、实物、视频等形式，全面了解临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就。特别是对临沂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创立、发展和领导沂蒙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下，沂蒙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奋斗史、建设历程有了深入了解。

市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史志研究院）到“第一书记”任职村开展走访慰问。1月23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第一书记”任职村走访慰问，并调研“第一书记”工作。院领导班子听取了任职“第一书记”工作汇报和下步工作打算，对2019年“第一书记”任职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并实地查看了施工现场。随后开展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活动，共走访村内困难群众20余户，送上大米、肉制品等慰问品，价值6000余元。

市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史志研究院）春节走访慰问困难职工。1月23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史志研究院）对结对帮扶困难职工冯国斌进行走访慰问。冯国斌系市外贸肉品进出口总公司原职工，夫妻均下岗多年，本人患脑血栓，全家依靠低保维持生活，近期身体不适正在住院。慰问人员详细了解了冯国斌的身体状况、家庭成员、存在的生活困难和问题，送上慰问金、慰问品价值1000余元。

市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史志研究院）等走访慰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1月23日下午，市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史志研究院）一行，走访慰问单位离退休老干部。走访看望了

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史志办老同志，通报了近期机构改革合并事宜和下一步工作打算，认真听取了老干部对党史史志工作的意见建议。每到一家都与老干部手拉手促膝谈心，悉心了解他们的思想、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希望所有的老同志能够保重身体，继续发扬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多为党史史志工作献计献策。老干部们纷纷表示一定发挥余热，尽最大努力献计献策、参与工作，继续为全市党史史志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全院干部职工大会召开。2月1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市委关于机构改革的有关精神，部署安排全院机构改革工作。

会议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院干部职工一定要把机构改革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作为检验干部职工政治站位高不高、“四个意识”牢不牢、“四个服从”和“两个维护”坚定不坚定的标尺，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心聚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参与改革、配合改革、推动改革。

会议强调，全院干部职工要坚持“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全力落实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坚持政治立院，推动党史史志工作融合发展。全院干部职工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高昂的干事劲头，提早谋划今年的各项工作，起好步、开好头，全力推进党史、史志工作的融合发展。要继承发扬过去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在新

的“大家庭”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开拓创新，共同书写新的篇章，努力开创党史、史志工作崭新的局面，为大美临沂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委党史研究院赴兰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2月28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全体党员赴兰陵县开展“学英模、做奉献”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观看了代村发展历程专题纪录片，听取了“时代楷模”王传喜同志的专题报告，参观了代村辉煌中国展馆、中国知青村等处，市委党史研究院向代村社区捐赠党史史志书籍价值3万余元。全体党员还赴鲁南革命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